

西流

學術叢刊第二輯

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

卷頭語

學術叢刊第一輯出版於去年十二月，距今快有一季了；遲延之咎，我們殊難見諒於讀者。但這裏我們不想多事辯解，只希望以後能常與讀者見面。

本輯只包括五篇長文，文字方面雖不免有些沉重；但理論上的價值却很崇高。

L·T·君的兩篇文章最值得推薦。『馬克思經濟學的新評價』，一方面以最熟習的事實釋明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基本原理，同時又根據了馬克思的原理與方法，解釋了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種種新的現象。在這篇不太長的文字中，如果你肯用心研究的話，保管你不僅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論據，不僅能明白此種學說由七八十年來歷史所證實的科學性，並且還能在表面似乎瘋狂的世界中，發見出唯一光明的前途，因而確定你努力的方針。

『中日戰爭與中國革命』一文，是由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及其教訓的研究出發，討論到中日戰爭，並預示其可能的前途。所以牠非但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而且更含有最迫切的實踐意義。

自從德蘇協定到芬蘇戰爭，半年來史大林的政策真叫全世界的『政論家』顯盡了原形。有些昨天的『蘇聯之友』，今天

却在大叫其『蘇維埃帝國主義』。而不久還稱國社黨爲人類大敵的莫斯科應聲蟲們，現在竟尊稱希特勒爲『社會主義的朋友』了。誰如果不滿於這種迷亂的論調，並想知道史大林與希特勒攜手的原因何在及其後果如何，那就請讀『希特勒與史大林』這篇短文吧。

以游擊戰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差不多已成爲一切民族戰士的普遍信念。但試問有幾人對這問題做過深刻的研究和思索呢？譬如游擊區經濟的特性如何？抗戰以來農村中階級關係的演變如何？敵人經濟侵略對游擊區的危險到如何程度？游擊戰勝利的保障是什麼？所有這些問題，我想每一個不願自欺的人，總不肯說已經思索過的吧？然而這是不得不叫我們思索的，因爲沒有理智作根據的信念決不會發生真實的力量。本輯中『論游擊區的經濟基礎』一文，至少將予讀者們於研究此重大問題時以一個可貴的幫助。

『最後，但決不是最不重要的，』我們談到了抗戰中的物價問題。現在除了極少數富有者之外，差不多誰都感受到物價高漲的威脅；可是普通人都祇把牠當成一種瘟疫，一種不能抵抗的災難；有些人知道牠是戰爭的結果，更有些人明白牠爲『居奇囤積』所促成；但是誰能從現代社會的機構，即資本主義的法則中去尋找原因？更有誰能知道和牠鬥爭的方法，以及根本消滅此種『瘟疫』的道路呢？我們這篇物價問題却是這一方面的一個鄭重的分析。

(壽)

西 流

學術叢刊第二輯目錄

卷頭語(壽)

馬克思經濟學的新評價

L·T· (一)

中日戰爭與中國革命

L·T· (一)

希特勒與史大林

譯自美國自由雜誌 (五)

論游擊區的經濟基礎

柯大章 (一九)

抗戰中的物價問題

劉海生 (二九)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發行

學術叢刊第二輯

西 流

每冊實價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輯者 學術叢刊社

發行者 白 克 孟

上海公館馬路十二號

出版者 美商華盛頓出版印刷公司

房間五〇二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馬克思經濟學的新評價

I. T. P.

——介紹資本論卷一的節本——

貢獻給讀者的是一本什麼書？

本書係用馬克思自己的文字，簡潔地敘述着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原理。終究說來，直到如今還沒有一個人能比馬克思本人更好地闡明價值底勞動學說。*

馬克思的某些立論，尤其是在那最困難的第一章裏的，對於未入門的讀者也許像是太過於推敲，細分或『玄學』了。事實上，這種印象之發生，皆因為讀者不慣以科學方法來處置表面似乎是慣常的現象之故。商品已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那樣普遍、那樣習慣和熟識的一部分，竟使我們連想也想不到去考察一下：何以人們會把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重要東西拿去交換毫無用處的金銀餅了。問題還不限於商品。所有市場經濟的範疇都好像當作自明之理，毫不加以分析便被人接受了，彷彿牠們都是人類關係底自然的基礎似的。經濟過程的實體雖是人類勞動，原料，工具，機械，分工，以及必須在勞動過程參加者中間分配完成的生產品等；但如『商品』，『貨幣』，『工資』，『資本』，『利潤』，『稅』等範疇還依然只是經濟過程底各個不同方面在人類頭腦中的半神秘的反映，這個經濟過程是人類

所不了解的而且也不是受他們支配的。要弄牠們（即指上述的範疇——譯者）解釋明白，則一種澈底的經濟分析便不可少。

在美國，擁財百萬的人便被指為『價值』百萬，在這個國度裏，市場的概念比之任何別的地方都來得深入人心。但直到最近，美國人還很少想及經濟關係的性質。在最有勢力底經濟制度的國土中；經濟理論仍是極度貧乏。只有目前美國經濟底深刻的危機，才直率地使輿論碰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總之，無論誰如果沒有克服那種無批判地接受經濟發展反映於

* 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整個經濟學體系的基礎——的摘要，為鄂圖·萊爾先生所節，他對他的工作懷有深刻的了解。首先被刪除的是些陳舊的例子，其次便是那些今天只有歷史興味底著作的摘引，以及和現在已被遺忘的作家們的爭論，末了便是許多文件，這些文件不管為要了解某一時代是多麼的重要，但牠們却不適於作簡潔的說明，這種說明與其說是追求歷史的目的，還不如說是追求理論的目的。同時，萊爾先生却盡力保存科學分析底發展的連續性。我們相信：思想底邏輯的推論及其辯證的轉變，一點也沒有受損害。這一選本很有理由請大家用心的細讀。

頭腦的現成觀念的習慣，又無論誰如果沒有隨着馬克思的步趨，領悟商品之爲資本主義有機體底基本細胞的實質，誰便證明永遠不能科學地了解我們這個時代底最重要的表徵。

馬克思的方法

人類自從把科學當作自然底客觀循環的認識而建立起來之後，他便頑固地，執拗地使自己離開科學，替自己保留一個所謂與超感覺的力量（宗教），或與無時間性的道德戒律（觀念論）相媾通的特權。馬克思確定而永遠地給人類剝去這些可憎的特權，把人看作物質自然底演進過程中的一個自然的環節；把人類社會看作生產和分配的組織；把資本主義看作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

馬克思的目的並不是去發見經濟的「永恒規律」。他否認這種規律的存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各種不同經濟制度底綿續的歷史，而每一種經濟制度則按照牠自身的規律而活動着。從一個制度過渡到另一制度經常由生產力的生長，即技術及勞動組織的生長來決定。在未到達某一點之前，社會的變化性質上是量的變化，而且並不改變社會的，亦即佔優勢底財產形式的根基。當成熟的生產力再也不能自限於舊式財產形式之內時，便到達了某一點；於是社會秩序來了一個急激的，伴着震動的變革。原始共產體爲奴隸制所代替或補充；奴隸制又由農奴制度及其封建的上層建築所嬗連；十六世紀城市的商業發

展給歐洲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秩序，這個秩序往後又經過了幾個階段。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裏並不是研究一般的經濟，而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個經濟有牠自己的特殊規律。他只是順便提到其他的經濟制度，以便說明資本主義的特質。

原始的農家家族的自足經濟用不着『政治經濟學』，因爲牠一方面受自然力，另一方面受傳統力量的支配。希臘人或羅馬人底獨立的建築在奴隸勞動上面的自然經濟受着奴隸主底意志統治，而奴隸主的『計劃』又直接受自然及習慣律的決定。關於中世紀的莊園及其農奴也可以同樣說法。在上述所有的例子中，諸經濟關係就其原始的粗糙性上看來，是清楚和透明的。但近代社會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牠破壞了舊式的獨立的連繫和世襲的勞動方式。新的經濟關係已把城市和農村，省份和國家連結起來。分工已包括了這個星球。但這種關係雖然打破了傳統和常規，牠本身却並不是按照某種確定的計劃，而是離開人類底意識和先見而形成的。人，集團，階級，民族的互相依存導源於分工，牠不受任何人指揮。人們互相爲他人工作，却互相不識，不問彼此的需要，而希望，甚至深信他們的關係總能自行調整。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做法，或者不如說，他們習以爲常地做。

在資本主義社會成員底主觀的意識——意向或計劃——中找求資本主義社會反覆運動的原因是極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底客觀的反覆運動是在科學開始認真考慮牠們之前便形成了

的。直到如今，極大多數人還不曉得那些支配着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馬克思方法的全部力量就在他之觀察經濟的現象並不是根據某些人物的主觀觀點，而是根據整個社會發展底客觀的觀點，這猶之乎一個實驗的自然科學家之觀察一個蜂房或一個蟻窩一樣。

對經濟學有決定意義的是人們做什麼和如何做，並不是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想些什麼。社會的基礎不是宗教和道德，而是自然和勞動。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的，因為牠是從存在到意識而不是走相反的道路。馬克思的方法是辯證的，因為牠把自然和社會兩者都當作牠們是在演變着來看，而演變自身又是衝突力量底不斷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與官家科學

馬克思有他的前驅者。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史密斯，大衛·李嘉圖——在資本主義已衰老之前，在牠開始恐懼明天之前，達到了牠的最隆盛時代。馬克思對這兩個偉大的古典學者，寄予深深感激的美意。但古典經濟學的根本錯誤就是把資本主義看成爲人類永遠的正常生活，而不視爲僅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歷史階段。馬克思一開始便批判這種政治經濟學，暴露牠的錯誤，同時也暴露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及指出牠崩潰的必然性。

科學並不是在學者底隱閉的研究室中而是在充滿血肉的社

會中獲得牠的成果。一切使社會破裂的利益和情感都在科學，——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學，即貧富之學的發展上散佈牠們的影響。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迫使資產階級的理論家背棄剝削制度底科學的分析，而忙於經濟事實底乏味的描述，經濟底過去的研究，最壞的就是他們爲辯護資本主義制度而把事情全般偽造。目下在官家教育機關中教授着以及在資產階級報紙上鼓吹着的經濟學說，雖然貢獻不少重要的實際資料，但牠却非常無能去概括整個經濟過程及發現牠的規律和遠景，牠也一點不想這樣做。官家的政治經濟學是死亡了。

勞動價值律

在現代社會裏人類的主要連繫是交換。任何加入交換過程中的勞動生產品都成爲一個商品。馬克思着手他的研究由商品始，且從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的細胞中推出那些社會關係來，這些關係客觀上已在交換的基礎上面，離開人類的意志而自行形成。只有依照這個方法才能解決這個基本的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然每一個人都爲他自己着想，沒有一個人爲大家着想，那末又怎樣給生活所必需的各種不同的經濟部門造成相對的比例呢。

工人出賣他的勞動力，農民把他的生產品拿到市場去，貸款者及銀行家貸款，商店老板供給各種商品，工業家建立工廠，投機商人買賣股票和公債——每一個人都有他一己的打

算，他一己的私人計劃，他一己的對工資或利潤的關心。但從這種個別努力和行動的混沌一團中却浮現一個經濟的整體出來，不錯，這個整體並不是和諧的而是矛盾的，但牠不僅給社會以存在的可能，而且還給牠以發展的可能。這個意思就是說，混沌畢竟不是完全混沌，牠是按照某種方法機械地，如果不是意識地，被調節着的。要了解那種給經濟各個不同部分造成一個相對平衡狀態的機械作用，就是去發現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

顯然的，那些支配着資本主義經濟各個不同領域——工資，價格，地租，利潤，利息，信用，股票交易——的規律是數量繁多和複雜的。但最後計算起來，牠們都歸結到馬克思所發見和澈底暴露的一個單純的規律；那就是勞動價值律，這個規律確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調節器。這個規律的內容是簡單的。社會保有一定量活的勞動力的存儲。這一力量加工於自然而生產滿足人類慾望所必需的生產品。因為在獨立生產者之間發生分工，生產品便採取商品的形式。商品先是直接的，最後便經過黃金或貨幣的中介，互相按照一定的比率而交換。諸商品的基本性質以某一定的關係來使商品互相平等，這個性質就是支出在商品上的人類勞動——抽象的勞動，一般的勞動——亦即是價值的基礎和尺度。在幾千百萬分散的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并未使社會解體，這就是因為諸商品乃按照耗費在商品上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來交換。市場作爲一個交換的角逐

場，由接受和拒絕商品來斷定牠們本身是否包含社會的必需勞動，因之決定社會所必需底各種不同種類商品的比率，並因而又決定依照各種不同產業的勞動力的分配。

但市場的實際過程較之這幾行字所敘述的要無限的複雜。因此，價格便圍繞着勞動價值而擺動，搖擺於牠們底價值的上下。這種背離的原因，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已有充分的解釋，資本論第三卷就是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的。但雖然在個別的場合，諸商品底價格與價值之間的分歧也許很大，全部價格的總和却等於全部價值的總和，因為最後計算起來，社會所支配的只是人類勞動已創造了的價值，價格不能打破這個界限，甚至連托萊斯的獨佔價格也包括在內；勞動沒有創造新價值的地方，就是煤油大王洛克弗拉也不能獲得什麼。

不平等與剝削

但是假如諸商品是按照投在牠們裏面的勞動量來互相交換，那末怎樣從平等中產生出不平等來呢？馬克思暴露諸商品中之一個商品的特殊性質來解決這個謎，這個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基礎：即，勞動。生產手段的所有主——資本家購買勞動。牠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樣，按照投入牠裏面的勞動量，亦即按照工人延續生命和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手段來估值。但這個商品——勞動——的消費就是工作，即，創造新價值。這些價值的分量比之工人自己所領到的以及他爲了維持他生活

所支出的價值量還要大。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為的是剝削牠。不平等的根源就是這一剝削。

生產品中用以補償工人自己底生活費的部分，馬克思稱做必需的生產；工人生產超過於此的部份，則稱做剩餘生產。剩餘生產一定要由奴隸生產出來，否則奴隸主便不會保持任何奴隸。剩餘生產一定要由農奴產生出來，否則農奴制對土地貴族便沒有一點用處。剩餘勞動也同樣要由工資工人生產出來（程度只有更大），否則資本家就用不着購買勞動力。階級鬥爭無非是爭取剩餘生產的鬥爭。凡是佔有剩餘生產的人便是天之驕子——佔有財富，佔有國家，把持教會，法院，科學和藝術。

競爭和獨占

剝削工人底資本家之間的關係由競爭來決定，競爭在長期間已成了資本主義進展的大發條。大企業比之小企業享有技術上，財政上，組織上，經濟上以及最後，但意義并不最小的政治上的便利。資本的總額較大也就能够剝削較大數目的工人，而牠也就必然從競爭中獲勝。這便是資本底積集（Concentration）和集中（Centralization）過程的不可更動的基礎。

當競爭刺激技術的進步的發展時，牠不僅逐漸消滅那些中間的階層，而且還消滅牠自己。在中小資本家底死屍和半死屍之上浮現一些數目愈來愈小而勢力愈來愈大的資本主義大王出來。因此從公平的，民主的，進步的競爭中生長出無可挽回底

有害的，寄生的，反動的獨占。牠的霸權在前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確定，而在本世紀初又獲得固定的形式。現在則獨占的勝利已被那些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正式的代表*公開承認了。但當馬克思進行他的預測，最先從資本主義特有的趨勢中推論出獨占時，資產階級世界還視競爭為一個永恒的自然規律呢。

獨占消滅競爭，表示資本主義社會解體的開始。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創造大發條而且是資本家的歷史的護符。同時競爭的消滅又表明股票所有者轉變為社會的寄生蟲。競爭必須有若干自由，一種自由的大氣，一個民主的，與商業世界主義的政制。獨占却需要一個儘可能極權的政府，關稅壁壘，「牠自己的」原料來源和買賣的競爭地盤（殖民地）。在獨占資本的解體中，最時髦的便是法西斯主義。

財富底集中與階級矛盾底生長

資本家們及其擁護者們想用各種方法使財富集中的真實程度瞞過人民的眼睛，同時也瞞過收稅員的眼睛。不管事情已怎樣明白，資產階級報紙尚企圖支持資本投放底民主分配的幻想。紐約泰晤士報在駁斥馬克思主義者時指出：現在有三百萬至五百萬分立的勞動僱主。不錯，合股公司較之三百萬至五百

* 美國前任檢察長荷馬·S·甘銘士先生抱怨道，作為拘束力的競爭已逐漸被獨占所代替，且在很大的範圍內，只成了「一個影子似的東西，徒供人記起一度存在過底情境罷了。」

萬僱主代表着更大的資本集中，但美國却有『五十萬個股份公司』。人們之所以要玩弄總數與平均數字的方式，並不是爲的揭露而是爲的隱藏事物的真相。

從戰爭爆發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美國工廠的數目從指數一〇〇跌至九八·七，而工業生產的總數則從一〇〇增至一五六·三。在轟動一時的繁榮的幾年當中（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當每一個人都好像在大發橫財的時候，廠數由一〇〇跌至九三·八，而生產則由一〇〇增至一一三。商業機關的集中受了牠們底笨重的物質體的限制，遠落在牠們底靈魂，即所有權底集中的後面。一九二九年美國確實有三〇〇，〇〇〇以上的股份公司，誠如紐約泰晤士報所云。但有一點必需附帶說明的，就是這些公司中的二百家，即占總數的百分之〇·〇七，直接支配着所有公司底百分之四九·二的資產。四年之後，這個百分率已升至百分之五六，在羅斯福政府當權的幾年當中，牠無疑的升得還要高。在這二〇〇家領袖的合股公司裏面，真正的支配權又屬於很少的少數。*

在銀行和保險界內也可看出同樣的過程。美國五個最大的保險公司不僅已吸收了其他公司，甚至還吸收了許多銀行。銀行的總數是縮小了，實際上却是被吸收了，主要是採取所謂『合併公司』的形式。這種變動的程度迅速增加了。在銀行之上長出一個太上銀行的寡頭貴族。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合併而成爲金融的太上資本。假定產業與銀行的集中將以與過去二十五

年內同等的比率進行——事實上集中的速度正在加大——那末在將來二十五年的過程中，獨占家一定要吞沒國家的全部經濟，連窮寡婦的兩個小錢都不給留下。*

本文之引用美國統計只是因爲牠們更精確和更動人吧了。實際上，集中的過程是國際性的。通過資本主義的各個不同階段，經過行情變動的盈虧，經過所有政治制度，經過和平時期又經過武裝衝突的時期，一切大財產之集中於數目愈來愈少的人之手，已在進行而且將無底止的繼續下去。在大戰的幾年中，當各國方流血至死時，當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在公債的重壓之下破裂時，當財政系統已陷入深淵時，獨占家後面拖着中等階級，從血污中取得空前的利潤。美國最有勢力的公司在戰爭幾年當中把牠們的資產增加了兩倍，三倍，四倍和四倍以上，而且還使牠們的紅利膨脹至百分之三百，四百，九百和九百以上。

一八四〇年，即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前八年，那位著名的法國作家，阿勒西·德·托克菲爾在他的『美國上議院的一個委員會，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發現過去二十年來，十二個最大公司的決議等於對美國大部份產業的指令。這些公司底董事會會長的數目大約與美國總統底內閣，即，共和政府底執行部的閣員數目一樣。但這些董事會會長比之那些內閣閣員有無限大的權力。

* * 故事見新約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節。——譯者。

國之民主主義」一書中寫道：「大財富有消滅之勢，小資產的數目在增加。」這種思想已被重覆述說過無數次，先是援引美國，後來又援引其他年青的民治國，澳洲和紐西蘭。當然，托克菲爾的觀點在他自己那個時代已是錯誤的了。但財富的集中還只是在美國內戰之後，亦即在托克菲爾死之前夜才開始。在本世紀初，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已佔有該國全部財富的半數以上；在一九二九年，同樣的百分之二佔有國富的五分之三。同時，三萬六千富有之家的收入等於一千一百萬戶中等及貧苦之家的收入一樣大。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恐慌中，獨占機關却不用乞訴公家的慈善；相反的，他們比從來更甚地高出於國民經濟底一般衰落之上。隨後在『新規約』餡餅上發生的動搖的產業復興中，獨占家們又採取了大量的乳精。失業的數字充其量也不過從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減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不超過六千成年——却積蓄了出奇的紅利；這便是羅拔·H·約克遜大律師充任美國反托辣斯助理檢察長時，用數字證明了的。

但是，這個抽象的概念，『獨占資本』，在我們看來却是充滿了血肉的。牠的含義無非是少數家族*為血族的紐帶和共同利益而連結成功一個特出的資本主義寡頭貴族並支配着一個偉大國家底經濟和政治的財產。人們一定迫得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集中律已出色地實現了！

馬克思的學說已陳舊了嗎？

競爭，財富集中及獨占等問題自然要引出這個問題，即，究竟在我們這個時代，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只具有歷史的興味——比如亞當·史密斯的學說一樣——抑或牠仍舊有實際的意義呢。答覆這個問題的標準是簡單的：假如這個學說正確的估計發展的方向而且較之其他學說更好的預見未來，則牠仍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進步的學說，即使牠已有了幾十年之久。

著名的德國經濟學者維納·桑巴特在他涉世之初確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後來則把馬克思學說底較革命的部分通通加以修改，他用他自己的資本主義論來對抗馬克思的資本論，他這部書或許就是最近資產階級經濟辯護士的最著名的表現。桑巴特寫道：「卡爾·馬克思預言：第一，受僱工人底貧窮累增；第二，一般的「集中」伴着工匠及農民階級的消滅；第

* 美國作家斐迪南·倫堡雖則有他的學者的良心，但却是個頗為保守的經濟學者，他在他的書上寫的話是令人觸目的：「美國今天由最富足的六十家族所佔有和支配，而這一等級又由不下九十家次富的家族支持。」此外還可以加上第三層：大概尚有一百五十家族，每年收入在十萬美元以上。在美國支配的地位屬於六十家族的第一集團，他們不僅操縱着市場，還操縱着政府的一切權柄。他們才是真正的政府，「金元民主政治中之金錢政府。」

三，資本主義底終局的崩潰。這樣的事一宗也沒有實現過。」桑巴特提出他自己底『嚴格科學的』預測來對抗這一錯誤的預測。照他說來，『資本主義在其最繁盛時代已開始自行轉變，牠將繼續採取同樣的方向從內部自行轉變；牠愈加年久，則牠將愈加平靜，沈着和合理。』讓我們來證驗一下看，如果光是依照着兩個基本路線，究竟那一條正確；究竟是預測災切的馬克思呢，還是以全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名義認定萬事會被『平靜地，沈着地，合理地』調整的桑巴特呢。讀者將同意：這一問題是值得注意的。

(一)『貧窮累增說』

馬克司在桑巴特之前六十年寫道：『一極是富的積累，因此同時在相反一極，即，在那個以資本形式生產產品的階級方面，便是貧窮，勞動痛苦，奴隸制，無知，野蠻，心智墮落底積累。』馬克思這一命題，在『貧窮累增說』，這一名稱之下，已受到過民主主義者的及社會民主改良派的不斷攻擊，尤其在一八九六——一九一四年的時期中，當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且對工人，特別是對工人底上層作某些讓步之時。世界大戰之後，當資產階級爲牠自身的罪惡及十月革命所震驚而走向廣告式底社會改良（這種改良的價值立即又爲通貨膨脹及失業所取消）的道路時，資本主義社會漸進轉變的學說，在那些改良家和資產階級教授看來彷彿已有充分的保證了。桑巴特在一

九一八年向我們保證說，『僱傭勞動的購買力已與資本主義生產擴展正比例的增長。』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中，當勞苦羣衆某一層份（這一層份有時是頗爲廣大的）底生活水準的上升掩蓋了國民收入中無產階級應得部分的削減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經濟矛盾却加重了。因此恰好在陷於衰落之前，美國的工業生產，例如於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三〇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支付工資的總額則僅提高百分之三十，這就表示國民收入中勞動應得部分的驚人的減低。一九三〇年失業開始一種不祥的增長，一九三三年對失業工人多少作有系統的救濟，但這些失業工人在救濟金的形式中所領得的幾乎還沒有他們在工資的形式中所損失的一半。一切階級不斷『改進』的幻想已消失得無影無踪。羣衆生活水準底相對的低落已代之以絕對的低落。工人們開始節省一點子鄙吝的應酬，後來又節省他們的衣着，最後則節省他們的食糧。具有平均質地的貨物和生產品被次貨頂替，次貨又被最壞的來頂替。工會開始好像成了這麼一個人，他在迅速下降的電梯中絕望地靠着扶手往下降落。

美國擁有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但占有了全世界財富的百分之四十。可是誠如羅斯福本人所承認的，該國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營養不良，衣着不足且在非人的情形底下生活的。那末，對於那些享受較少特權的國家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自從上一次大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已無可辯駁地證實了那所

謂『貧窮累增的學說』。

法西斯政制只是把任何帝國主義底資本主義所固有之沒落和反動的界限歸結到極度而已，當資本主義的墮落已不能保持那提高無產階級生活水準的幻想時，法西斯政制便成了必不可少了的。法西斯獨裁就等於公開承認赤貧化的趨勢，這一趨勢，那些較富足的帝國主義民治國還在設法加以掩飾。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以那樣的憎恨來迫害馬克思主義，分明因為他們自身的政制就是馬克思主義預測的最可怕的確證。當戈林以他所特有的劊子手和丑角的口吻宣稱大砲較牛油為重要，或者當加利奧斯特羅——加沙諾瓦——莫索里尼勸意大利的工人把黑衫上的肚帶束得緊些時，文明世界都憤憤不平，或假裝憤憤不平起來。但實際上在帝國主義的民治國內不也發生同樣的事情麼？牛油到處都用來塗大砲了。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工人雖然沒有着黑衫，也學着拉緊他們的袴帶了。

(二) 產業後備軍與失業者的新的次階級

(New Subclass of the Unemployed)

產業後備軍成爲資本主義社會機構的一個不可少的構成部分，這猶之乎工廠堆棧中得貯藏着機器和原料，或商店中得存貯些完成的生產品一樣。假如沒有勞動力的存儲，則一般的生產擴張既不可能，就是使資本適應於工業行情變化底週期的漲落也不可能。從資本主義發展底一般的趨勢——犧牲可變資本

(勞動力)而增加不變資本(機械和原料)——中，馬克思得出這個結論：『社會的財富愈大——產業後備軍也愈大——一種固定的過剩人口的總數愈大——公認的貧窮也愈大。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底絕對的總法則。』

這個命題——與『貧窮累增說』不可解的連結一起，且幾十年來便被斥爲『誇大』，『別有作用』，和『妖言惑衆』——現在却已成爲事物真相底無可非議的理論的反映了。目前的失業軍再也不能視爲『後備軍』，因為牠的基本隊伍再也不能有任何復工的希望；相反的，牠還必然由新的失業者之不斷流入而膨脹起來。解體中的資本主義產生了一整代永無職業又無就職希望的青年人。這個處在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之間的新次階級不得不犧牲社會的財富以求生存。據估計，在九年(一九三〇——一九三八年)之內，失業已從美國的經濟中消去了四三，〇〇〇，〇〇〇餘成人勞動年(Labour man-year)。*一九二九年，到了繁榮的最高點，在美國有兩百萬失業者，又在上述的九年內，有工作能力而無工可作的工人數目已增加了五百萬，把這兩者合起來看，則所喪失的成人勞動年的總數一定還要無比的大。一個社會制度受了這樣一種疫病的侵襲，已病入膏肓了。這種病症的適切的診斷差不多在四十年前，當這個病的本身還在萌芽時代便已作出了。

* 即每人一年內所能貢獻的勞動量——譯者。

(三) 中等階級的沒落

表明資本集中的數字附帶指出中等階級在生產中的比重以及牠在國民收入中的應得部分已不斷的低落，而小產業不是完全被吞沒，便是被貶黜和被奪去牠們的獨立性，而成爲不可忍受的勞苦與絕望的貧乏之唯一標記。不錯，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已大大地引起工程師，經理，事務員，書記，律師，醫生——一句話，即所謂『新中間階級』這羣人的增加。但這一階層的增長，就是對馬克思也已經不是神秘的了，牠和舊中間階級很少有共同之點，舊中間階級因爲佔有自己的生產手段，牠便有一個經濟獨立的確實保證。那個『新中間階級』則依賴資本家較之依賴工人更密切。真的，中間階級多分是他們的工頭。而且，在中間階級之中也已發現了大大的生產過剩及其社會地位的墮落了。

像上述美國前任檢察長荷馬·S·甘銘士那像遠離馬克思主義的人也說：『可靠的統計報告證明許多工業的單位已完全消滅了，且證明有這樣的事發生，即，小商家之逐漸的消滅已成了美國生活的一個動力。』但桑巴特反對說：『一般的集中伴着工匠及農民階級的消滅』尙未發生。馬克思像每一個理論家一樣，他一開始便使那些根本的趨勢按照其純淨的形式孤立起來，否則要想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便完全不可能了。但馬克思本人却充分能夠藉助於具體的分析把生活的現象當作不

同歷史因素底結合的產品來觀察。牛頓的定律確乎沒有爲這一事實所推翻，即，諸物體下落的速率隨各種不同的條件而變化，或星球運行的軌道會遭受擾亂。

爲要了解那所謂中間階級的『頑強性』，最好還是記着中間階級之沒落與這些沒落階級之轉變爲無產階級，這兩種趨勢發展，並不採取平衡的步驟也不達到相同的程度。因爲機械對勞動力的優勢不斷增大，故中間階級沒落的過程愈往前發展，則牠愈要超過他們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其實在某一個時機中，後者一定完全停頓而且甚至往後退。

正好像生理學定律的作用，在一個正在生長的有機體中產生的結果，與在一個正在死亡的有機體中產生的結果並不相同一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濟定律在一個發展的和一個解體的資本主義中也以不同的方式來證實的。這種不同在城市與農村的相互關係中表現得特別清楚。美國的農業人口較之總人口雖然按照比較緩慢的比率增加，但一直到一九一〇年，當牠的總數已達三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時，牠的絕對數字仍繼續增加。在往後二十年中，雖然該國的總人口迅速增加，但農業人口却跌至三〇，四〇〇，〇〇〇，即減少了一，六〇〇，〇〇〇人。但一九三五年牠又重新升至三二，八〇〇，〇〇〇，比之一九三〇年膨脹了二，四〇〇，〇〇〇。這樣的變化，初看起來是奇怪的，但牠一點也沒有推翻城市人口靠犧牲農村人口而增加的趨勢，也沒有推翻中間階級分化的趨勢，同時牠倒

這種其有力的表明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解體。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底嚴重恐慌的時期中，農業人口的增加簡單地由這一事實來解釋，即差不多有兩百萬城市人口，或更恰當的說，兩百萬飢餓的失業者遷入農村——到農民放棄了的地區或他們底故鄉的農場去，以便把他們被社會排棄了的勞動力運用於生產的自然經濟，同時也好苟延一種半飢餓的殘息，不致完全挨餓。

因此，問題倒不在於小農民，工匠和商店老板的穩定，而在於他們底狀況的極度無告。中間階級不是未來的一個保證，而是過去的一個不幸的和悲慘的遺物。資本主義雖不能完全除去牠，但牠已設法把牠縮小到卑下和窮迫的極致。農民不僅被剝奪了他那塊土地所應納給他的地租和他投下的資本的利潤，甚至還被剝奪了他底工資的大部分。同樣的，城市中的小人物也在痛苦中度着他們經濟生活與死亡之間的短促歲月。中間階級之並未無產階級化而只是因為牠已赤貧化吧了。就是在這個問題上也很難找出一個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論據來反對馬克思。

(四) 產業恐慌

前世紀末及本世紀初的標記便是資本主義造成了這樣勢不可當的進步，彷彿週期的恐慌只是一些『偶然的』煩惱吧了。在差不多普遍的資本主義的樂觀時期中，馬克思的批評者向我們保證說：托辣斯，辛特加和卡特爾底全國的和國際的發展，

實行了對市場之有計劃的管理，且預示出對恐慌的最後勝利。據桑巴特說，恐慌已於戰前被資本主義的機構本身『廢除』了，因此，『在今天，恐慌的問題實際上使我們不感重要了。』現在，僅僅十年之後，這些話都好像是空洞的滑稽之談，同時只有在我們這個時期，馬克思的預測才充分顯露出牠悲痛的論據之足信。

資產階級報紙半吞半吐地想否認獨占的存在，但牠又利用這同一的獨占來半吞半吐地否認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假如六十家族操縱了美國的經濟生活，紐約泰晤士報諷刺地說，『那就證明美國資本主義不是「無政府的」和「無計劃的」……而是以偉大的靈活性組織起來的了。』這個論據是打錯了靶。資本主義已不能把牠的任何一個趨勢發展到底。恰如財富集中之沒有廢除中間階級，獨占也沒有廢除競爭，牠只是壓迫牠和不斷破壞牠吧了。各種各色的計劃與六十家族中每一家族的『計劃』一樣，一點也不顧到調整經濟的各個不同部門，而只願犧牲其他集團和犧牲整個民族來增加他們自己底獨占集團的利潤。最後的估計起來，像這一類計劃的交叉，只有加深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吧了。

一九二九年的恐慌爆發於美國，正是桑巴特宣佈他的『科學』極不重視於恐慌問題之後一年。美國經濟從空前繁榮的頂點被投進異常衰頹的深淵去。在馬克思時代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測像這樣大的震動的！美國的國民收入於一九二〇年已升至六

十九萬萬美元，第二年便跌至五十萬萬美元，即跌去百分之二十七。因為隨後幾年的繁榮，國民收入又重新上升，一九二九年達到牠的八十一萬萬美元的最高點，但一九三二年又跌至四十三萬萬美元，即跌去一半以上！採用一九二九年底勞動和收入的標準（當時「只」有兩百萬失業者），在一九三〇——一九三八年九個年頭之內大約損失了四千三百萬人的勞動年，和一百三十三萬美元的國民收入。假如所有這些還不算無政府狀態，那末這個名詞的意義又可能解作什麼呢？

（五）『崩潰學說』

在馬克思逝世時期和世界大戰爆發之間，中間階級知識份子和工會官僚的心坎，幾乎完全被資本主義的成功迷醉了。逐漸改進（『演進』）的思想好像已永遠妥當，而革命的思想則被認作只是野蠻主義的一個遺跡。馬克思的預測被對抗以本質上相反的預測，即關於國民收入底更平衡的分配，階級矛盾底緩和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底逐漸改良的預測。若望·左累斯，這位在那個古典時期一個最富於天稟的社會民主黨人，希望逐漸用社會的內容來充實政治上的民主主義。改良主義的實質就在這裏。這就是另一決擇的預測。牠現在留下什麼來呢？

在我們這個時代，獨占資本主義的生活就是一連串的恐慌。每一個恐慌就是一個災難。因為要藉助於關稅壁壘，通貨膨脹，增加政府開銷，和借債來解救這些部分的災難，便又準

備了新的，更深刻和更廣泛的恐慌。市場，原料和殖民地的爭奪使軍事的災難成爲不可避免。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準備革命的災難。桑巴特說年老的資本主義愈來愈變成『平靜，沈着和合理』，確實令人難於苟同。說她正在喪失牠底理性的最後痕跡也許更適當些。無論如何，這一點是沒有懷疑的，即『崩潰說』已勝過了和平發展說了。

資本主義的衰朽

市場的支配對於社會不管如何浪費，人類在某一階段，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仍然經過部分的和一般的恐慌而自行生長，發展和富足起來。生產手段的私有權在那一個時期內仍舊是一個比較進步的因素。但是現在，價值法則的盲目的支配，已拒絕繼續服務了。人類的進步已陷入死巷中。雖然技術思想有最新的成就，但物質生產力已不復生長了。這種衰朽的最明白的象徵就是這一點，即因爲在經濟的基本部門中新的投資的停頓，全世界已停止了建設工業了。資本家們簡直再也不能相信他們自身制度的未來。由政府所發動的建設也就等於提高捐稅和縮減那『無限制的』國民收入，自從政府新建設的主要部分已直接撥作戰爭之用以來，尤其如此。

虛癆病已在人類活動的最古老的領域，即與人類基本的生存攸關的需要關連得最密切的領域——農業中，獲得一種特別惡劣的性質。採取最反動形式底私有權，即小土地底私有權

之障礙農業發展，已不復使那些資本主義政府滿意，牠們已不得不經常藉助於法律和行政的手段把生產加以人工的限制，這些手段就是沒落時期的行會工匠也會吃驚的。歷史將記載一個最有力量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竟以獎金獎勵農民減削他們的耕種，即人工地縮小那已經下跌的國民收入。結果是自明的：雖然經驗和科學已保證了偉大的生產可能性，農村經濟並沒有從一種腐敗的恐慌中抬起頭來，而餓殍的數目——人類的絕大多數，仍然較之我們這個星球的總人口的增加率，更迅速地增加着。保守黨人認爲保護一個已陷於這樣破壞底瘋狂狀態中的社會秩序的政治是賢明的，他們又斥責那反對這種瘋狂狀態的社會主義鬥爭爲破壞的空想主義。

法西斯主義與新規約

爲了拯救歷史上已判了死刑的資本主義：今天在世界角逐場上有兩個辦法在互爭雄長——法西斯主義和新規約。法西斯主義把牠們的政綱建築在勞動組織的剝滅，社會改革的破壞，和民主主義權利的完全消滅上，牠這樣做爲的是預防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復活。法西斯國家以拯救『國家』和『種族』爲名——沒落的資本主義就冒着這些假想的名義出現——正式把工人的退化和中間階級的赤貧化加以合法化。

新規約政策想用賄賂工農貴族的方法來拯救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但就其廣大的範圍看來，牠只能適用於最富有的國

家，那末，在這一意義上，牠便是最適於美國底一種政策。美國政府曾企圖把這一政策底代價的一部分轉嫁到獨占家的雙肩上，勸他們提高工資和縮短勞動日，並因而增加人民的購買力及擴張生產。里昂·勃倫姆想把這一說教翻譯成初等法文。但徒勞無功！法國資本家與美國資本家無異，他們並不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是爲利潤而生產。他常常準備限制生產，甚至不惜毀壞製成了的生產品，假如他自己在國民收入的應得部分因此而增加的話。

新規約的政綱尤其自相矛盾，政府一方面向資本大王們講授什麼豐足勝於凶荒的說教，一方又頒發獎金獎勵節制生產。還能够有比此更大的混亂麼。但這個政府用挑戰的口吻駁倒牠的批評者說：你們能幹得更好麼？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局勢已無望了。

在美國，自一九三三年起，即在最近六年之內，聯邦政府，各州或各市政府發給失業者的救濟金約十五萬萬美元，這筆款子的本身原是不够用的，而且只是代表工資損失的較小部分，但同時拿減低的國民收入來看，牠却是一筆巨大款子。一九三八年是經濟相當復興的一年，在這一年中美國的内債增加了二萬萬美元，打破了三十八萬萬美元的紀錄，或較之上次世界大戰末的最高點高出二十萬萬美元。在一九三九年牠早就打破了四十萬萬美元的紀錄。那末怎麼樣呢？內債增加當然是後代的一個負擔。但新規約本身之所以可能實行只是因爲先代積

彙了驚人的財富。只有一個極富有的國家才能縱情實施這樣奢侈的政策。但即使像這樣一個國家也不能無限制地繼續靠先代的餘蔭來生活。新規約政策帶着牠的虛構的成果和牠的實際增加內債，必然要走到資本主義兇惡的反動和帝國主義之力足以摧毀一切的爆炸。換句話說，牠得和法西斯主義政策走入相同的道路去。

是變態抑是常規

美國內政部長哈勞德·L·易克斯認為『全部歷史中最奇怪的變態之一』就是：美國形式上是民主的，實質上是貴族式的：『美國是一個多數人治理的國家，但至少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却受獨占業支配着，而獨占業回頭又受牠們底股票所有者底極少數的人所支配。』除了暗示羅斯福上台後，獨占的統治已停止或削弱這一點之外，上述的診斷是正確的。但易克斯所稱的『全部歷史中最奇怪的變態之一』事實上却是資本主義底毫無問題的常規。強者統治弱者，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剝削者統治勞苦大眾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個基本法則。美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只是牠底資本主義的規模更大及其矛盾的險惡性更大吧了。不會有過封建的歷史，天然資源的豐富，能幹和富於企業心的人民，一言以蔽之，一切預示民主主義底不斷發展的先決條件，已實際上造成了財富之瘋狂的集中。

易克斯這時自告奮勇想一鼓而戰勝獨占業，他冒失地把湯

馬士·藉華生，昂德勞·約克遜，阿伯拉罕·林肯，第阿多爾·羅斯福和吳德婁·威爾遜等當作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先輩來追述。他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說，『我們底最偉大的歷史人物之所以揚名於世，就是因為他們進行頑強和勇敢的奮鬥去阻止權力過度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但從他這些話裏却推出這樣的結論來，即，這種『頑強和勇敢的奮鬥』的果實就是財閥對民主政治的完全支配。

爲着某種莫明其妙的理由，易克斯認爲此刻勝利是有把握的，假如人民懂得這一鬥爭『不是在新規約與每一個開明的商人之間，而是在新規約與六十家族的波旁皇們*之間，這些波旁皇已把美國其餘的商人都放在他們底統治的恐怖之下了。』這位權威的發言人却不解釋一下：究竟『波旁皇們』怎樣置民主和『最大的歷史人物』的努力於不顧，而設法臣服一切開明的商人呢？那些洛克弗拉們，* * 摩爾根們，麥倫們，樊達比爾特們，古根舍們，福特們都不是從外面侵入美國，像哥爾蒂茲(Cortis)之入侵墨西哥一樣的；他們從『人民』，或更精確的說，從那個『開明工商業家』的階級中有機地生長出來，而且和馬克思的診斷不謀而合，成了資本主義底自然的最高峯了。既然年富力強的民主主義在旺盛時代尙不能趁着財富集中的過程方在開始的時候，加以遏止，難道還能叫人即令

* 波旁，法國王朝之一——譯者。

* * 下列諸人爲美國的各業大王——譯者。

在一分鐘之內相信沒落的民主主義倒能夠削弱那已達到了極限的階級矛盾嗎？無論如何，新規約的經驗並沒有產生出這種樂觀的根據。羅拔·H·約克生是政府機關的一位高級人員，他在反駁大商業控告政府時，用數目字證明在羅斯福任期內，資本大王們的利潤達到了高度，這在上屆胡佛總統任內，連他們自己都不敢夢想的。由此可知，羅斯福反對獨占業的鬥爭並沒有比他一切先輩的奮鬥得到更大的成功。

叫昨天回來

當羅斯福政府被前任預算主任列維士·W·杜格拉斯教授指責為「在某一方面攻擊獨占，在其他許多方面則助長獨占」時，人們只有附和。但按照事物的本性，牠也只能如此。照馬克思看來，政府就是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今天，獨占家就是統治階級的最強部分。沒有一個政府願意去反對一般的獨占，即，反對牠本身要仰仗其意旨來統治的那個階級。當牠攻擊獨占的某一面時，牠不得不在獨占的另些方面找尋一個同盟者。聯合銀行和輕工業，牠便能夠對重工業的托辣斯施行偶爾的打擊，但重工業的托辣斯並不因為這而停止賺那瘋狂的利潤。

列維士·杜格拉斯不是拿科學來對抗官家的庸醫醫術，只是拿另一種庸醫醫術來對抗牠吧了。他不是在本主義中，而是在保護政策中，找出獨占的根源，並因此發現拯救社會之法

不在乎生產手段私有權之廢除而在於減低關稅壁壘。他預言道，「除非恢復市場的自由，否則一切文物制度——企業，言論，教育，宗教——的自由能否殘存，殊屬疑問。」換句話說，如果不恢復國際貿易的自由，則不管什麼地方只要民主主義尚殘存着，牠便必須屈服於革命或法西斯獨裁。但如沒有國內貿易的自由，即競爭，國際貿易的自由是不可思議的。而競爭的自由在獨占稱霸之下也是不可思議的。可惜杜格拉斯先生十足學易克斯先生，約克生先生又十足學甘銘士先生和羅斯福先生本人一樣，並沒有費點神把他自己的反獨占資本主義的，並藉此以反對革命或全能主義政制的藥方教給我們。

貿易自由像競爭自由及中間階級繁榮一樣屬於不可挽回的過去了。叫逝去的昨天回來，乃是現在資本主義民主改良家們的唯一丹方：給中小規模的工商業者多挽回一點「自由」，為他們的利益而改變貨幣和信用制度，從托辣斯的把持中解放市場，消滅股票交易中的專門投機家，恢復國際貿易自由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改良家甚至還夢想限制機械的應用和禁止技術，因為技術擾亂社會的平衡且惹起諸般煩惱。

科學家和馬克思主義

羅拔·A·密里根博士，美國最有名的物理學家，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演講，為科學作辯護道：「美國的統計證明五十年來「報酬優厚的僱傭者」，在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數

確實增加了，同時科學也已極迅速的被應用了。」在保護科學的掩飾之下來保護資本主義，這種保護不能叫做一種聰明的保護。顯然的，恰恰在過去五十年當中「時代的連環被打破了」而經濟與技術的互相關係也劇烈的變動了。密里根所指的時期包括資本主義沒落的開始和資本主義繁榮的最高點。諱言這一世界規模底沒落的開始也就等於充當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密里根博士藉助於幾乎連亨利·福特也不齒的論據，用一種不客氣的態度來排斥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又告訴我們說，如果不提高生產的程度，任何分配制度也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不向美國幾千百萬失業者說明他們怎樣去參預提高國民收入，這是一件憾事。抽象地宣揚個人創意力之濟世的好處和勞動底高度生產力，一定不會給失業者以職業，不會填補預算的不足，也不會引導國家的商業離開牠的死巷的。

馬克思最出類拔萃的就是他天才的普遍性，他能把各種不同領域的現象和過程從其固有關連中加以了解的才能。他雖不是自然科學界的專家，但激賞這方面底偉大發明（例如達爾文學說）的重要性的，他還是第一人。馬克思之獲得這種卓越性與其說是由於他底知識，還不如說是由於他底方法。懷着資產階級思想的科學家也許以為他們是高出於社會主義；但羅拔·密里根的例子只是又一度地證實：在社會學領域內，他們仍然是一批無望的庸醫而已。

生產的可能性與私有權

一九三七年初羅斯福向國會演講，在他的演辭裏，他表示渴望提高國民收入至九十或一百萬萬美元，但沒有說明怎樣提高法。就這計劃的本身而論，那是非常起碼的。一九二九年約有兩百萬失業者，但國民收入却達到八十一萬萬美元。假如把目前的生產力加以運用則不僅足夠實現羅斯福的計劃，而且還要大大超過牠。機械，原料，工人，什麼東西都是現成的，至於人民對生產品的需要更不用提了。假如雖然有了上述的條件而這個計劃還不能實現——確是不能實現——那末唯一的原因就是資本主義所有權與社會擴張生產底需要之間發展出來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著名的由政府發起的「全國生產潛能測驗」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根據零售價格計算，一九二九年用去的生產和服務費達九十四萬萬美元左右。但假如把所有真正的生產潛能應用起來，這個數字恐怕要升至一百三十五萬萬美元，而每個家庭每年便平均得到四千三百七十美元，足夠保證一個小康和舒服的生活。我們還必須補說一句，「全國測驗」的估計乃根據美國現在的生產組織，而這個組織却是由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歷史產生的。假如這種設備本身根據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來重新加以設備，則生產的估計就能夠大大超過而且就能夠在極短的勞動日基礎上給人民保證一個高度的生活水準。

因此，爲了挽救社會，無需阻止技術的發展，關閉工廠，

頒發獎金獎勵農民怠耕，使三分之一工人變成赤貧，或請瘋子們去做獨裁者。這些手段都是對社會利益的一種極可惡的嘲弄，牠們中沒有一樣是必需的。目前急需和迫切去做的就是把生產手段與牠們現在的寄生所有主分開，並依照一個合理的計劃來組織社會。那時就真正能立刻把社會的病治好。一切能够做工的就會找到一份職業。工作日就會逐漸減短。一切社會成員的慾望就會愈來愈滿足。『貧窮』，『恐慌』，『剝削』等字眼就不會流行。人類就會最後跨過真正人道的門限。

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馬克思說：『一方面是資本大王的數目不斷減少，另一方面便是貧窮，壓迫，奴隸制，墮落，剝削的數量增大；但與此同時也增長了工人階級的反叛，這一階級的數目經常在增加而且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加以訓練，統一，組織。……生產手段的集中化與勞動的社會化最後到達了這一點，即，牠們已和牠們的資本主義外殼陷於矛盾。這個外殼便被炸裂。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喪鐘敲響了。剝削者被剝削了。』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在馬克思看來，改造社會的問題並不是發生於某種藥方，以他個人的偏好為動機而產生的藥方；牠是一個歷史底鐵的必然——一方面是生產力生長得非常成熟的結果；另一方面又是這些生產力不能在價值律的支配之下更進一步的結果。

某些知識分子關於這題目的迂腐作品，以為不管馬克思的

學說如何，社會主義總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他們這些作品連一點內容也沒有。馬克思顯然沒有暗示過：沒有人類的意志和行動社會主義也會實現，任何這一類思想都簡直是一種謬論。馬克思曾預言過：從資本主義發展必然造成的經濟破產——這一破產就在我們眼前——中，不能找到別的出路，除非是生產手段的社會化。這些生產力需要一個新的組織者和一個新的主人，既然存在決定意識，馬克思就一點也不懷疑：工人階級以錯誤和失敗為代價將終於了解這個真實的情勢，且遲早將作出必需的實踐的結論。

資本主義創造出來底生產手段的社會化之有驚人的經濟利益，今天不僅在理論上可證明，而且還被蘇聯的實驗證明了，雖然這一實驗還是有限的。不錯，資本主義的反動派把史大林政制當作一個稻草人來利用（並不是沒有做作的），以反對社會主義思想。事實上，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能够在一個國家，尤其是在一個落後國家內完成的。蘇聯羣衆之繼續貧困，高踞於國家及其貧困上面底特權層的無限權力，最後官僚們底狂暴的警棍政策都不具社會主義經濟方法的後果，而是陷於帝國主義句圍的蘇聯底孤立和落後的後果。值得奇怪的就是在這樣非常不利的條件之下，計劃經濟也設法證明了牠的無可超越的利益。

一切資本主義的救主，不管民主的也好，法西斯的也好，都設法限制或至少隱蔽資本大王們的權力，為的是預防『剝

剝削者』。他們通通都知道，而且他們許多人也公開承認，他們底改良企圖一失敗便必不可避免的引起社會主義革命。他們通通已準備證明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的方法都只是一些反動和無告的庸醫醫術。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底必然性的預測因此就由反面的證據充分證實了。

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

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大恐慌時期，『技術政治』會盛極一時，牠的政綱是建立在這個正確的前提上的，即，只有由高度科學的技術與服務社會的政府統一起來，經濟才能合理化。這樣的統一是不可能的，假如技術和政府都從私有權的奴隸制中解放出來的話。偉大的革命任務就是從這裏開始。爲了把技術從私人利益的匪幫中解放出來以及使政府爲社會服務，便必需『剝削剝削者。』只有一個强有力的階級，即從事於自身的解放和反對獨占剝削者的階級，才能完成這一任務。合格的技師層只有和一個無產階級政府一致合作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科學的和一個真正全民的，亦即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

當然，用和平的，漸進的，民主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但已過了時的社會秩序却永不會無抵抗地讓位於其繼承者的。假如年富力強的民主主義當盛時尙已證明不能防止財閥之掠奪財富和權力，難道還能期望一個衰老和受了蹂躪的民主主義有能力去改變六十家族恣意統治的社會秩序

嗎？理論和歷史教訓我們，社會制度的嬗遞須先經過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即，革命。在美國不經過一個內戰甚至連奴隸制也不能廢除。『暴力是每一個孕育着新社會底舊社會的產婆。』還沒有一個人能够駁到馬克思這一階級社會底社會學的基本教義。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掃清到社會主義之路。

美國的馬克思主義

北美共和國在技術和生產組織方面已較之其他國家走得更遠。不僅美國人，就是全人類也將建築在這個基礎上。但是同一國家內，社會過程的各個不同方面，依照特殊的歷史條件而有種種不同的節奏。當美國在技術學上享有驚人的優越性時，牠的經濟思想却無論左派右派都極其落後。約翰·L·列維士*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懷着同樣的見解。拿他底職務的性質來看，列維士的社會作用比之羅斯福的是無比的保守，反動是更不用說了。在某些美國人中，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排拒這一種或那一種急進的理論而不經過半點科學的批評，只是簡單的稱之爲『非美國的』而鄙棄之。但是你們從什麼地方找到這種區別的標準呢？基督教是和數學上的對數，沙士比亞的詩，人權與公民觀念，以及其他某些並非不重要的人類思想產物一同輸入美國的。今天馬克思主義也同屬此類。

美國的農業部長亨利·A·華頓斯資本文作者具有『……

* 美國改良主義工會領袖——譯者。

極端非美國的一種教條的狹隘性』，且以約弗遜總統的機會主義精神來對抗俄國的獨斷教義，因為約弗遜頗懂得怎樣和他的政敵和睦相處。顯然的，華賴斯先生從未想到一個妥協的政策並不是某種非物質的民族精神的功能而是物質條件的產物。一個迅速發財的國家便有充足的後備資源來調和敵對的階級和政黨。當另一方面，社會的矛盾尖銳起來的時候，妥協的餘地便消滅了。美國之所以脫離『教條的狹隘性』，只是因為牠有過多的處女地，無窮的天然富源以及（彷彿）無限致富的機會吧了。但即使在這些條件之下，當內戰的時刻一到，妥協的精神還確實沒有阻止了牠。無論如何，造成『阿美利堅主義』基礎的物質條件今天已愈來愈貶到過去了。傳統的美國觀念的深刻危機，就在這裏。

經驗主義的思想只限於隨時隨刻解決即時的任務，只要馬克思的價值法則尚支配每一個人的思想，這種經驗主義思想在勞工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內都好像足够了。但今天上述的法則是產生了相反的結果。牠並沒有推進經濟而是掘毀牠的基礎。調和的折衷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教條』而對牠採取一種不贊成或輕視的態度，但這一思想和牠的哲學最高峯——實驗主義已變得非常不夠，愈來愈空虛，反動和十足滑稽。

相反的，正是『阿美利堅主義』的傳統思想才已成了無生氣的，化石式的『教條』，而這『教條』則除了生出錯誤和混亂之外便沒有別的了。但同時，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却已在美

國獲得特別的生氣和尖銳性。雖然資本論依靠國際的，多分是依靠英國的材料，但從牠的理論基礎看來，牠却是純粹資本主義，一般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本身的一個分析。無疑的，在美國底處女的無歷史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最接近於資本主義的這種理想的典型。

說句叫華賴斯先生不中聽的話，美國在經濟上不曾依照約弗遜的原則而是依照馬克思的法則發展了的。承認這一點，正好似承認美國依照牛頓的定律繞着太陽而旋轉一樣，絲毫沒有冒犯民族的自尊心。資本論給了這個病狀一個無誤的診斷和一個不可代替的預測。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學說較之胡佛和羅斯福，格林*和列維士的思想更充滿新『阿美利堅主義』了。

不錯，在美國有一種普及的論究美國經濟恐慌的道地著作。只要有良心的經濟學者把美國資本主義的破壞傾向加以客觀的描寫，不管他們的理論前提如何，他們的研究終歸貌似馬克思學說的直接說明。但當這些作者固執地不作出確定的結論，自限於憂鬱的預言或作出好像『本國必須了解』，『輿論必須忠實地考慮』之類的無味的教誨時，保守的傳統立即露出尾巴來了。這些書本好像一把沒有利刃的刀。

不錯，美國過去也有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種奇怪的典型，或者不如說，三種奇怪的典型。第

* 美國最保守的工會領袖——譯者。

一，有一批從歐洲逐出的亡命客，他們盡力工作但找不到絲毫反響；第二，孤立的美國團體（如德·里昂派 De Leonists），他們在事變的過程中，因為他們自身的錯誤，自行分裂成數派；第三，一批玩賞家，他們受十月革命吸引而且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與美國很少關係的異邦教義來同情。他們的日子已完結了。現在無產階級獨立階級運動以及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開始了。在這時代裏，美國也只須幾跳便能趕上歐洲且越過牠。進步的技術和進步的社會結構將在理論方面鋪平他們自己的道路。馬克思主義的最好的理論家將出現於美國領土上。馬克思將成了前進的美國工人們的導師。這本（資本論）第一卷的縮本對他們將只是了解馬克思全貌的一個初步吧了。

資本主義的理想的鏡子

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英國資產階級的世界霸權尚未被侵犯。商品經濟底抽象的法則自然要在資本主義已得到最高度發展的國家裏，找到牠們底完滿的體現，即，很少依存於過去底影響的體現。馬克思的分析雖主要靠英國，但他心目中不僅有英國，還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他把他那個時期的英國當作資本主義底最好的近代的鏡子來利用。

現在英國的霸權僅留在記憶中了。資本主義底長子身分的便利已成了不利。英國底技術的和經濟的結構已成了殘舊。這個國家與其說是仍舊依賴於積極的經濟潛力，還不如說是依賴

於牠底過去的遺產——殖民帝國的世界地位。這一點偶然的說明了張伯倫對法西斯黨徒底國際強盜政策所懷的基督教的仁慈，這種仁慈竟使每一個人都那樣驚奇不住。英國資產階級不能不知道牠的經濟衰落已和牠的世界地位絕難相容，而一個新的戰爭又有促進不列顛帝國傾覆之虞。法國底『和平主義』的經濟基礎實際上也是一樣。

相反的，德國在牠底迅速的資本主義的上升中，因為拿歐洲底最完全的技術武裝自己，故已利用了歷史底落後性的便利。德國只有一個狹隘的國家基礎和少量的資源，她那機動性的資本主義已必然地在世界列強的所謂均勢中成了一個最富於爆炸性的因素。希特勒底瘋狂的思想只是德國資本主義底瘋癲病的映像。

除了一種歷史性質的許多無價的便利之外，美國的發展還享有這一優越性，即享有較之德國無限廣大的領土和無比豐饒的天富。在本世紀初，北美共和國已大大的超過了大不列顛，成了世界資產階級的主要堡壘。在那裏，所有深植在資本主義內的潛能都找到了牠們最高的可能的表現。在我們的星球上還沒有別的地方讓資產階級能夠用什麼辦法來超過牠在金元共和國所獲得的成果，這個共和國自二十世紀以來已成了資本主義的最完好的鏡子了。

馬克思寧願拿英國的統計，英國的國會報告，英國的『藍皮書』等來做他底暴露的根據，由於上述同樣的理由，我們在

這篇不加虛飾的序文裏却主要從美國底經濟和政治的經驗中採用例證。不消說，從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中引用類似的事實和數字是並不困難的。但這並沒有加添任何重要的東西。結論將仍舊一樣，只不過這些例子不大動人吧了。

法國人民陣綫的經濟政策，正如牠的一個財政家適切地描寫牠一樣，是使新規約適用於『小人國人』。在理論分析中，對付大人國人較之對付小人國人的偉丈夫要無限的便利，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正是羅斯福底試驗的廣大性才證明只有一個奇蹟才能挽救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恰好又停止了奇蹟的生產。上帝化身和祈禱者多起來了，奇蹟却永遠不來。但顯然的，假如資本主義返老還童的奇蹟能够在什麼地方出現的話，牠也只有在美國。可是這一返老還童却没有成功。大人國人所無法做到的，小人國人也就更少可能去完成。我們瀏覽美國經濟領域的意義，就是要為這一簡單的結論奠定基礎。

母國和殖民地

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一版序文裏寫道：『產業較發展的國家向較不發展的國家指出其自身底未來的形象』。這種思想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能照字面來了解。生產力的生長和社會矛盾的加深無疑是每一個在資產階級發展道路上出發的國家底命運。但是，整個人類發展底速度和水準的不平衡，在資本主義

之下不僅已變得特別尖銳，而且還在經濟形態不同的國家間生出隸屬、剝削和壓迫底複雜的與互相依賴的關係。

只有少數國家才充分經過有系統的，邏輯的而且馬克思加以那樣詳盡分析過的發展，即，從手工業經過家內製造業以至工廠的發展。商業，工業和金融資本從外面侵入落後國家，部分地破壞了土著經濟的原始形式，又部分地使牠們屈服於西方底遍及世界的工業和銀行系統。在帝國主義的皮鞭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迫得拋開中間的階段，同時又人工地停滯在這一水準或另一水準上。印度發展沒有重演英國的發展：牠只是牠的一個補足。但為要了解像印度這樣落後和附屬底國家發展的綜合形態，往往需要記着馬克思從英國發展中得出來的古典的要略。價值的勞動學說同樣的指導着倫敦市底投機家的估算和海峽拉巴德最遼遠底角落的銀錢兌換的交易，只不過在後者的場合，牠採取更簡單和較不狡猾的形式吧了。

發展的不平衡使先進國獲得驚人利益，這些先進國繼續犧牲（雖然程度不一）落後國而發展，剝削她們，使她們淪為她們的殖民地，或者至少使她們不能夠走入資本主義的貴族裏。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底財富不僅是從她們本國無產階級的剩餘勞動，也不僅由於蹂躪她們本國的小資產階級，而且還是經過有系統地掠劫她們底海外領土而獲得的。階級的剝削被補足了，而牠的效能也因為民族的剝削而增加。

母國的資產階級之能夠替其本國無產階級，特別是上層份

子保證一個特權的地位，就是因為牠拿殖民地中聚斂來的若干超額利潤付給他們。沒有這一點，無論什麼穩定的民主政制都絕不可能。資產階級民主按照其擴大的表現，成了而且繼續成爲一種政府的形式，但這種形式只能適用於最貴族的和最剝削的國家。古代的民主主義建築在奴隸制上，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則建築在殖民地的劫掠上。

美國表面上幾乎沒有殖民地，但她却是歷史上一切國家中最享受特權的一個。從歐洲來的積極的移民佔領一個非常富足的大陸，消滅了土著居民，奪取墨西哥底最好的部分而且囊括了世界財富的絕大部分。這樣積聚起來的豐厚的積蓄甚至現在，在沒落的時期也還繼續用來塗滑民主主義的輪齒。

最近的歷史經驗與理論的分析，一道證明民主主義底發展的速率及其穩定性與階級矛盾的緊張性成反比例。較少特權的國家（一方面是俄國；另一方面是德，意等國）不能產生一個數目很多和穩定的工人貴族，因此在這些國家裏面，民主主義從來沒有什麼發展而且比較容易的向獨裁屈服。但是，資本主義繼續累進的寄生性也在替最有特權和最富足底國家的民主主義準備着同樣的命運：唯一的不同只是日期吧了。工人生活狀況底不可遏止的惡化使資產階級愈來愈少可能給予羣衆以參加政治生活的權利，即使這一生生活，只限於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範圍之內。凡對民主主義受法西斯主義驅除這一個明晰的過程，作任何其他解釋，都只是欺騙或自欺，是把事物的真相加

以唯心的偽造而已。

帝國主義在資本的古老母國中破壞民主主義，同時又在落後國家中阻退民主主義的抬頭。在新時代裏竟沒有一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會完成牠的民主革命——主要是在土地關係方面，這一事實完全歸罪於帝國主義，因為牠在經濟和政治的進展上已成了主要的制動機了。獨占大王和他們的政府一方面掠劫落後國家的天然富藏和煞費苦心的限制牠們底獨立的工業發展，另一方面同時又給予土著剝削者底最反動的，寄生的，半封建的集團以財政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幫助。人工地維持土地的野蠻主義是今天近代世界經濟底最有害的疫病。殖民地人民爲他們底解放而作的鬥爭，跳過中間階段，必然轉變成爲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並這樣地和母國無產階級的鬥爭站在一條線上。殖民地的蜂起和戰爭，到頭來又越發搖撼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且使牠再生的奇蹟越不可能。

計劃的世界經濟

資本主義把技術放到高度的水準上又用經濟的紐帶把世界各部分連結起來，這是牠完成了一對變生的歷史功勞。因此牠又替我們這個星球底一切資源的有系統的利用，保證了物質的先決條件。但資本主義却不願意完成這一迫切的任務（即指有系統的利用地球的一切資源——譯者）。牠底擴張的根據地仍舊是用關稅局和軍隊困守着的民族主義國家。但生產力却久已

衝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因此把一度會是進步的歷史因素轉變為一個不可忍受的束縛。帝國主義戰爭無非是生產力反對國界的爆發而已，國界對牠們（即指生產力——譯者）已太過局促了。所謂奧太基（自足經濟——譯者）的計劃與回到自供自給的閉關經濟風馬牛不相及。牠的意思只是為準備一個新的戰爭而造出一個民族的基礎。

凡爾賽和約簽訂之後，一般人都相信地球非常美滿的被細分了。但最近許多事變却提醒我們，原來我們這個星球依然包含有尚未被掠劫或未被充分掠劫的土地。殖民地的爭奪依然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政策之主要部分。不管這個世界瓜分得如何澈底，這個過程是永遠不完結的，牠只有隨着帝國主義勢力關係的變動而三番四覆的把重新再分割的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這便是今天重整軍備，外交激變和戰爭拉攏的真正原因。

想把臨近的戰爭來代表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思想間的衝突，所有這些企圖不是屬於騙人便是愚蠢。政治的形式雖變，資本主義的貪慾尚在。假如明天法西斯政制在英倫海峽的兩岸建立起來——差不多誰也不敢否認這一可能性——巴黎和倫敦的獨裁者對他們的殖民地領土和莫索里尼，希特勒對他們的殖民地要求一樣難於放棄。為了重新分割世界底瘋狂和絕望的戰爭，無可抗拒的跟着資本主義制度底致命的恐慌到來了。

部分的改良和挖肉補瘡的工作將無濟於事。歷史的發展已走到這些決定階段之一，即，只有羣衆的直接干涉才能够肅清

反動的障礙和奠定一個新制度的基礎了。生產手段底私有權的廢除是計劃經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而計劃經濟也就是首先在國家規模上，往後又在世界規模上把理性導入人類關係的領域中。社會主義一度開始，牠將以一種比法西斯主義今天的擴展力還要大無數倍的力量，一國一國地蔓延。以先進國作則且憑藉她們的幫助，落後國將也被捲入社會主義的主流裏去。腐爛透頂的關稅閘門將要傾覆。使歐洲和世界破裂的矛盾將在歐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社會主義聯邦的範圍內找到牠們底自然的與和平的解決。解放了的人性將自行發展到牠的充分的高度。

一九三九年（劉少儼譯）

地上天國的一個小統計

（壽）

現在，一切還想替資本制度辯護的人，都拿美國來作實例，彷彿那裏的資本主義已經實現了理想的樂園似的；然而我們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紐約社會呼聲報上，却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統計：

「據最近政府發表的一九三八年所得稅統計：每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者為五十五人，在百萬元以下者一一五人，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者為二〇七人；共計三七七人每年收入總數為三萬萬元！」

「美國全人口為七千六百萬，三七七人約占全人口之二十萬分之一，但所得却占國民總收入（數年平均數為五十萬萬元）之十六分之一！」

「在七千六百萬人中，據說有八百萬家是一絕無生存之「資」，一千一百萬家則「與貧窮相搏鬥」，每年每家收入在一千元以下。」

中日戰爭與中國革命

L·T·

——伊羅生著中國大革命史序言——

首先，本書作者乃屬於歷史唯物論學派這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我們的眼中，完全不足以爲他的這一著作贏得嘉許。在目前的條件之下，馬克思主義這個標記，首先祇能在我們的心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們先行接受了。與蘇維埃國家的墮落密切相關，馬克思主義在過去的十五年中經歷了一個空前的衰落與貶損的時期。從一個分析與批評的工具變成爲一種廉價辯護的工具。牠不去分析事實，而祇忙於爲高升的奴才們的利益尋找詭辯。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中，共產國際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本書對牠有很詳細的描寫。但在共產國際的文彙中，我們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圖予中國革命以一幅周詳的圖畫的，却總是徒勞，不過我們還能找到幾十種『行情性』的著作，牠們卑順地反映着共產國際政策，或更正確些說，蘇維埃對華外交政策的每一個曲折，且把事實與一般的論斷穿鑿附會於每一個曲折。這種文獻祇能叫人引起心裏的反感，而伊羅生的書則與此相反，牠從頭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學的著作。他秉着科學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與補充材料，并以此種研究作爲本書的根據。伊羅生從事本書的著作，花了三年多的光

陰。還有一點也得說明的，就是他以前以記者及中國生活觀察者的資格，在中國度過了差不多有五年之久。

本書著者以革命家的資格研究革命，他覺得並無理由去隱瞞這一點。在庸人俗子看來，一個革命的觀點實際上就等於科學的客觀性之缺如。我們以爲恰恰相反，祇有一個革命家，——當然他得具有科學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觀動力。一種思想，要是能够了解事物，那末，一般說來都不是潛想的而是行動的。爲要滲透到自然與社會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個外科醫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極度的注意力分別出一個機體中各種不同的肌絡一樣，一個革命家（如果他對他的任務具有嚴肅態度的話），必須以嚴格的良心，分析社會的結構，牠的作用與反射。

要了解目前的中日戰爭，必須以第二次的中國革命作出發點。在這兩個場合中，我們不僅遇見了相同的社會力量，而且還常常遇見同樣的人物。祇叫提到×××這個人物在本書中佔着中心地位，就够說明這一點了。當這幾行文字正在寫的時候，還難於預言中日戰爭將在何時如何結束。不過遠東目前衝突的結局，無論如何，祇具有臨時的性質。那個以不可抗拒

的力量正在臨近的世界大戰，將把中國問題拿來與殖民地霸權的其他問題重新作一次觀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問題在於：依照帝國主義間力量的新關係來重分地球。將來主要的鬥爭場當然不是立立普脫國*裏的洗澡管——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的盆地。戰鬥的最重要的目的物將是中國這個含有全人類四分之一的國家。蘇聯——未來戰爭中的另一個大注——的命運，也將在某種限度以內決定於遠東。爲這一次巨人們的衝突作準備——東京今天便企圖在亞洲大陸上給自己保證一個儘可能廣大的操演場。大不列顛與北美合衆國也同樣地不願錯失時機。不過，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世界大戰仍不能造成最後的結果，因爲在牠的後面將跟着發生許多次的革命，牠們不僅將重新考慮戰爭的決定，並且還要解決所有那些引起戰爭的條件——這一點，實際上連這些目前命運的締造者們也都承認的。

這個前途，我們必須承認牠絕不是一首田園詩，而是克雷奧，即是歷史的女神，她從來不會做過貴婦人和平會的會員。經歷這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的較老的一代人，不會解決他們任務中的一個。他們把戰爭與革命的重負作爲遺產傳給了新的一代。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與最悲慘的事情時常是比肩前進的。他們確實地將造成未來數十年代的背景。現在我們祇能希望那不能擅自脫離遺傳環境的新生代，至少要更好地，學習到他們所生息的時代的法則。爲要熟悉一九二五——

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在今天是找不到一個比本書更好的指導了。

雖然盎格魯薩克森人的天才無疑是偉大的，但人們也不能不見到最不懂得革命法則的人，却正在盎格魯薩克森族的國家中這一個事實。這事情的解釋一方面在於：這些國家中的發生革命已成爲很久的過去，所以那些官式的『社會學家們』對革命彷彿對兒時的狂歡一樣，祇能引起謙遜的微笑。另一方面，在盎格魯薩克森人思想中占如此顯著地位的實驗主義，要想用以了解革命的危機那是最沒有用的。

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與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一樣，其任務在於使社會的結構『合理化』，即是要肅清社會上封建的鐘乳石與石筍，且使社會受自由競爭這個法則的支配；自由競爭在那個時代，彷彿是『常識』的法則。爲要做到這一點，清教徒革命便給自己穿上了聖經的衣飾，因此暴露出一種純粹幼稚的能力，竟致不能了解牠本身的意義。法國革命對美國的進步思想會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那次革命是爲純粹唯理主義的公式所引導的。常識（牠還害怕自己，故求助於聖經上先知們的假面具）或世俗化的常識（牠把社會看成爲一種合理『契約』的產物），直至如今還是盎格魯薩克森思想在哲學與社會學領域內的基本形態。

* 格利佛遊記中的小人國——譯者。

但是歷史上的真實社會，可不會依照了盧梭的說法，而在一個合理的『契約』上建造起來，也不會遵照着邊沁的意見而根據於『最大幸福』的原則，而是在衝突與矛盾的基礎上，『不合理地』開展着的。爲使革命成爲不可避免，階級衝突得緊張至破裂點。恰恰是這個衝突之歷史地不可逃避的必然性（牠不依賴着善意或惡意，而是依賴於階級之客觀的相互關係）造成了革命與戰爭——這個歷史過程『不合理』基礎之最精采的表現。

不過『不合理』的意思，並非等於一任己意。恰恰相反，在革命之分子運動式的準備中，在牠的爆發中，牠的上升與低落中，有一種深刻的內部法則在，牠能被人了解，且在主要之處，能爲人預見。誠如人們不止一次地說過：革命具有牠們自身的邏輯。但這不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甚至更不是『常識』之實驗主義的半邏輯。她是思想之較高的機能：發展及其矛盾的邏輯，也就是辯證法。

這樣看來，盎格魯薩克遜的實驗主義的頑固及其對辯證法思想的仇視，自有其物質的原因。恰恰像一個詩人沒有本身經驗而徒然讀書得不到辯證法一樣，一個富裕的社會，不受慣震動，習於不斷的『進步』，是不能了解牠自身發展的辯證法的。不過，此種盎格魯薩克遜世界的特權，極顯然已退向過去之中了。歷史正在準備教授大不列顛與美國以幾課認真的辯證法。

本書作者試將中國革命的性質不從先天的定義與歷史的類比中演繹，而從中國社會之活的結構及其內在力量的動力中求得。這是該書主要的方法論上的價值之所在。讀者將不僅欣賞一幅關於事件進展之結構甚好的圖畫，而更重要的還將學習着了解這些事件的社會的總發條。祇有站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正確地評量鬥爭着的各政黨的政綱與口號。這些政綱與口號在過程中雖不是獨立的，而且在最後分析中也不是決定的因素，但還是革命過程之最明顯的標記。

未完成的中國革命就其切近的目的而論，乃是『資產階級的』。不過這名稱之應用祇是過去資產階級革命的回聲，所以牠實在不能給我們什麼幫助，歷史的類比須在具體的社會學的分析中加以校對，否則牠會成爲心智的陷阱。在中國正在鬥爭着的的是些什麼階級？這些階級的相互關係是什麼？這些關係正在如何與向何處變化？中國革命的客觀任務，即那些被發展過程所決定的任務，是什麼？這些任務之解決落在什麼階級的肩膀上？牠們能用什麼方法來解決？伊羅生的書恰恰予這些問題以解答。

殖民地的與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後的——國家，包括着人類之最大部分，這些國家的落後程度極其不同，牠們形成了一種歷史進化的梯階，從游牧生活，甚至從食人生活起，一直到最現代的工業文化。在或種程度之內一些極端的結合，乃是一切落後國家的特徵。不過落後性的等級——如果我們可

以應用這個名稱的話——是由每一殖民地國家生活中的野蠻主義與文化的成分之比重來決定的。非洲赤道國遠落在亞爾及爾之後，巴拉圭比墨西哥落後，阿比西尼亞比印度或中國落後，牠們在經濟上雖然共同依存於帝國主義的宗主國，但牠們在政治上的依存關係却有些地方帶有公開殖民地的奴隸性質（如印度，非洲赤道國），而另一些則掩蓋在虛偽的國家獨立之下（如中國，拉丁美洲諸國）。

落後性在土地關係中找到了最有機的與殘酷的表现。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曾經把民主革命實行到任何真實的範圍。半途而止的土地改革，被半農奴式的關係所吞沒，而這些關係在貧窮與壓迫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會再生出來。土地關係上的野蠻主義，常常與道路之缺乏，各省的孤立，「中世紀式」的特殊主義，與民族意識之缺如，同時存在。從社會關係中清除出古代的殘餘與現代封建主義的硬殼，乃是所有這些國家中之最重要的任務。

不過祇叫保存着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依存關係，那末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帝國主義一方面固然移植資本主義的關係，但另一方面却支持着並重新創造着一切奴隸的與農奴的形態。因此，為社會關係的民主化與為建立民族國家而進行的鬥爭，就不間斷地轉入於反對外國統治的公開暴動中去。

歷史的落後性，這含義並非說要在較遲一二或三個世紀之後，去簡單地重覆英國或法國那樣先進國家的發展。這落後性

產生一種完全新的「綜合的」社會形態，在這形態中，資本主義在技術與結構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於封建的或前封建的野蠻主義的關係中，改變着這些關係，征服着牠們，並且創造着一種特殊的階級關係。

在這些落後國家中，沒有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能在「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得到解決，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之很快產生，是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之下，故對人民而言，乃是一個異類的或敵對的階級。在這階級發展的每一階段上，總祇有更加密切地束縛於外國的財政資本。他們本質上是此種資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即從事於手藝與小買賣的人，首先成為與外國資本作勢力懸殊的鬥爭的犧牲者，他們在經濟上衰落至無足輕重的地步，成為非階級的與赤貧化了。這等人要起一個獨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連想都想不到。農民，這個數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後與最受壓迫的階級，能進行地方性的暴動與游擊戰，但需要一個比較前進的與集中的階級的領導，好使這一鬥爭高升到一個全民族的水準。這樣的一個領導，自然落在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身上了，因為牠從最初起，就不僅對外國的就是對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也立於相反的地位。

地理上的接近與官僚機關，把中國的各省與各部早就聯結成一個整體，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已使這個整體變成一個經濟整體的模樣。羣衆的革命運動第一次把這逐漸增長的統一翻譯

成民族意識的言語。在罷工，農民暴動，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軍事征伐中，一個新的中國產生了。那些與本國及外國的資產階級相聯結的軍閥，祇能將國家弄得四分五裂，這時中國工人却成爲國家統一之不可抗拒的推動力之掌旗手了。這一運動，無可爭論地能與法國第三等級反特殊主義的鬥爭，或與後來德國與意大利人爲國家統一所作的鬥爭相比擬。但中國又與資本主義初生的國家不同，在那些國家中，完成國家統一的問題落於小資產階級的肩上，部分的還在資產階級的，甚至在地主（普魯士！）的領導之下，而在中國則無產階級出來作這一運動的原動力與潛能的領袖。但是恰恰因此，無產階級使資產階級感受到一種危險，即統一後的祖國的領導權將不操在後者的手中了。在全部歷史中，愛國主義總與政權與財產不可分離地相聯結的。感受到危險之時，統治階級是從來不惜使他們自己的國家分解的，他們祇求在這種方式之下，能使他們在一部分的國土上保持權力。因此，如果以×××爲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掉轉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這國家統一的掌旗手，那是完全不足奇的。關於這一轉變的描寫與解釋，占據着伊羅生這書的中心地位，牠給了我們一個了解中國革命與目前中日戰爭之基本問題的鎖鑰。

那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祇叫有保持自己特權存在的希望，那麼能容忍國家墮落的一切形式。但當外國資本想霸占國家的全部財富時，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便迫得記起牠的『民族』責任

來了。在羣衆的壓力之下，牠甚至還能跳進戰爭中去。但這戰爭祇能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中之一，即反對那最無法談判的一個，而進行戰爭時所懷着的希望，只是想轉替某一更寬大的強國服務罷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祇能在大不列顛或美國保護者所指示的限度以內進行。祇有那個除了鐵鏈之外無物可失的階級，才能爲民族解放進行反帝戰爭到底。

上面發揮的，關於歷史上晚起國家中『資產階級』革命之特性的那些觀點，絕對不是簡單理論分析的結果。在第二次中國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前，牠們早已受到大規模的歷史測驗了。三次俄國革命（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二月與十月）的經驗，對二十世紀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並不比法國革命對十九世紀所具有的意義爲小。要了解現代中國的命運，讀者一定得注意到俄國革命運動中思想的鬥爭，因爲這些思想對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曾經起過，而如今還在起着一種直接的，並且是有力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則起一種間接的影響。

正因爲沙皇俄羅斯的歷史的落後性，使牠成爲歐洲唯一的國家，即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這種學說與社會民主黨這種政黨，便發展到了有力的地步。民主主義的鬥爭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間，或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恰恰在俄國受到了理論的分析，這是很自然的。第一個把這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初提出來的，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

的創造者普列哈諾夫。在反對那所謂民粹主義（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普列哈諾夫認爲俄國沒有任何理由希望走一條發展的特權道路，他認爲俄國跟那些『不神聖的』國家一樣，也得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又以爲在這條道路上，爲要繼續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鬥爭，必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制。普列哈諾夫不僅把那作爲一個任務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分開，（他把社會主義革命延遲到不定的將來），而且他還把力量的結合加以完全不同的描寫：資產階級的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聯合自由資產階級來完成，並由此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清除道路，經過幾十年之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高水平上，無產階級將直接與資產階級鬥爭，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

列寧——當然不是立刻地——更改了這個學說。在本世紀之初，他以一種比普列哈諾夫更大的力量與更澈底的態度，提出了土地問題作爲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問題。因此他得到一個結論：自由資產階級是反對剝奪地主財產的，而正因爲這個理由，自由資產階級會在普魯士式的憲法基礎上與皇朝謀得妥協。列寧反對普列哈諾夫無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聯盟的思想，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的思想。這兩個階級革命合作的目的，他認爲在於建立『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專政』，這是唯一的方法，可用以肅清沙皇國中的封建警察的殘渣，建立一個自由的農民制度，且給美國式路線的資本主義

發展清除道路。列寧的公式在這一方面是前進了一大步，即與普列哈諾夫的公式相反，牠正確地指出了革命的中心任務，即土地關係之民主主義的變動，並且同樣正確地約略規定出能解決這一任務的一些階級力量之唯一現實主義的結合。但一直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列寧本人的思想始終束縛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傳統的觀念上。跟普列哈諾夫一樣，列寧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即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才能列入當前的議程中。而且與後來不肖門徒們所捏造的傳說相反，列寧認爲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後，農民的全體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列寧把社會主義的希望寄託在農業勞動者與出賣勞動力的半無產者化的農民身上。

列寧這個觀念的弱點，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專政』這一內在矛盾的思想。兩個階級，他們的利益祇有一部分相符合，那末他們的政治同盟便不能有成立專政的可能。列寧本人着重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基本限度，所以公開稱牠是資產階級的。他之所以這樣幹，意思就是說無產階級爲了保持與農民的聯盟，在未來的革命中，得避免直接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但是確切地說，這意思就是無產階級得放棄專政了。在這樣的情形中，革命的政權將集中在誰的手裏呢？在農民的手裏嗎？但農民是最不能起這樣的作用的。

列寧在提出他有名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的大綱之前，把這些問題放着不加回答。祇在四月大綱上，他才第一次跟『資

產階級』革命的傳統了解與『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公式相決裂。他聲明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鬥爭，乃是徹底實行土地革命與保證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唯一方法。不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由於本性使然，不能自限於資產階級財產的範圍以內。無產階級的統治自然而然而要把社會主義的革命置於議事日程之上。在這樣的情形中，社會主義革命與民主革命並非由任何歷史的時期分開的，而是不間斷地連接着，或者說得更加確切些，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之有機體的生長。至於社會之社會主義的轉變將以何種速度發生，以及將在最近將來達到何種限度，那不僅要看內部的，而且也要看外部的條件而定。俄國革命不過是國際革命之一環。這樣，已經約略地說明了永恒（不斷）革命這個觀念的本質了。恰恰是這個觀念，保證了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中的勝利。

但是歷史之殘酷的嘲弄竟會如此：俄國革命的經驗不僅沒有幫助了中國的無產階級，而且相反的，牠以一種反動的與彎曲的形式，成爲中國無產階級前進路上的一些主要障礙之一。不肖門徒們的共產國際開始替東方各國把『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這個公式加以神聖化，而列寧在歷史經驗的影響之下，早已承認這公式爲沒有價值的了。一個公式業已陳舊，那牠所掩蓋的政治內容會與牠當年所代表的直接相反，這在歷史上是常有的事。平民大眾，工農的革命聯盟，由那自由選舉的，作爲直接行動機關的蘇維埃來加以膠結，而共產國際却代

之以各黨中央機關的官僚的聯盟。在這聯盟中，農民的代表權則意外地給了××黨，這個極關心於保持資本家財產，不僅要保持生產工具，而且要保持土地財產的十足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則擴大成『四階級的同盟』：即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與那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換句話說，共產國際揀起了被列寧所拋棄的公式，祇爲要打道到普列哈諾夫的政治中去，而且還是在一種戴上假面具的，因而是更惡毒的形式中進行的。

爲替無產階級在政治上之從屬資產階級作辯護，共產國際的理論家們（史大林，布哈林）便援引帝國主義壓迫這一個事實，彷彿這壓迫會逼『全國一切進步力量』結成同盟的。但這正是當年俄國門雪維克的論據呢，所不同的只是那時沙皇制度代替了帝國主義吧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之服從×××，表示牠之與羣衆運動分裂，而且是對於牠歷史任務之一個直接的背叛。第二次中國革命的慘敗，就是這樣地在莫斯科的直接領導之下準備好的。

許多政治上的庸人俗子，總願意把『常識』的猜測來代替科學分析，他們覺得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革命性質及其階級力量的動力所進行的爭論，彷彿是簡單的學院主義。然而歷史的經驗表示出俄國馬克思主義『教條公式』之深具活力的重要意義。那些直到今天還不懂得這一點的人，能够從易洛生的書裏學到許多。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政治，深刻地表示出：如果布

爾雪維克不曾及時地拋開門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那末俄國革命會變成什麼東西。在中國，不斷革命的觀念再度被證實了，不過這次並非以勝利的形式，而是以慘敗的形式來證實的。

當然，把俄國與中國等量齊觀是不允許的。牠們雖然有這些重要的共同點，但異點却仍然太明顯。不過人們不難相信，這些異點並非減弱，反而加強了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基本結論。在一種意義上說，沙俄也是一個殖民地國家，這可以在外國資本的優勢作用上看出來。不過俄國資產階級對於外國帝國主義，比中國資產階級享有不可比擬的更大的獨立性。俄國本身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俄國的自由主義固然卑瑣，但比之於中國的自由主義却具有遠較重大的傳統與更有力量的支持基礎。在自由派的左邊，站着一些強有力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牠們對沙皇制度的關係有的是革命的，有的是半革命的。社會革命黨設法在農民中，主要在農民的上層中，獲得了很大的擁護。社會民主黨（門雪維克）的背後，領導着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與勞動貴族。恰恰是這三個政黨——自由派，社會革命黨與門雪維克——在長期間準備了，且在一九一七年確定地組成了一個聯盟，這在當時雖還不會被稱為人民陣線，但已具有牠的一切特性。與此相反，布爾雪維克則從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起，便對自由資產階級採取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立場。祇有這個政策，牠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失敗主義』上達

到了最高的表現，）才能使布爾雪維克奪取了政權。

中國與俄國不同的地方：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外國資本之無可比擬的更大的依賴，小資產階級中獨立的革命傳統之缺如，工農大眾之圍繞於共產國際的旗幟之下，這一切，如果可能，都需要執行一個比在俄國執行過的更不可調和的政策。但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與學究氣的『×××主義』，加入了×××，那從牠的紀律。換句話說。牠在對資產階級屈服的道路上，走得比以前俄國門雪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所走過的更遠。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着這個同樣致命的政策了。

從布爾雪維克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官僚，怎麼能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應用根本與布爾雪維克主義相反的方法呢？誰假使用這個或那個人的無能或愚蠢來回答這一問題，那就太膚淺了。問題的中心在於：由於新的生存條件，官僚們已經獲得了新的思想方法。布爾雪維克黨領導羣衆，官僚則開始命令他們。布爾雪維克用正確地表現羣衆利益的方法來徵取領導的可能性，官僚們則不得不藉助指揮的方法，以便保證他們與羣衆利益相反的自己的利益。指揮的方法自然也擴展到共產國際中去。莫斯科的領袖認真地以爲他們能強迫中國資產階級走向牠利益的左邊，叫中國工農走向他們利益的右邊，共同沿着克里姆宮所劃定的對角線前進。但革命的本質就在於被剝削者與剝削者都用最極端的形式來表示自己的利益。如果敵對階級能依

對角線移動，那就沒有內戰的需要了。官僚以十月革命與共產國際的威望（不必提那用不盡的財源了）作武器，在革命最緊要的關頭，使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動力變成爲一架制動機。在德奧，官僚能把失敗的一部分責任轉嫁於社會民主黨，但在中國則不同，那裏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共產國際在毀滅中國革命的時候，是擁有獨占權的。

如果沒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羣衆有力的國民革命運動，目前××之統治大部分中國領土便不可能。對於運動的屠殺，一方面使權力集中在××之手，另一方面也命定了××在反帝鬥爭中祇能採取半吊子的辦法。這樣說來，了解中國革命的過程，對於中日戰爭過程的了解，具有最直接的意義。因此，這一歷史著作獲得了最實際的政治意義。

在最近將來的中國歷史中，戰爭與革命行將交織着。日本的目的，想占領幾個戰略中心點，以圖永遠，或至少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奴屬一個龐大的國家，這不僅表示出她的貪婪，也證明出她頭腦的呆木。日本起來得太晚了。天皇的帝國被她內部的矛盾所撕裂，不能覆演不列顛興起的歷史。另一方面，中國已經遠超過十七與十八世紀的印度。舊的殖民地國家現在正在進行民族獨立的鬥爭，且獲得愈益重大的成功。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縱使目前遠東的戰爭結果日本勝利，縱使勝利者自身能在以後數年內逃過內部的災難——前後兩者都是極無把握的——那末日本統治中國的時期也是極短的。也許祇有

少數幾年，即爲中國經濟生活獲得新的推動與勞働大衆重新動員所需要的少數幾年。

日本的大托辣斯與公司，已經跟隨着軍隊前來分取那尚未拿穩的贖品。東京政府怕各派財閥會把華北裂成碎塊，所以要設法調節他們的胃口。如果日本能在占領區中保持大約十年的統治，那首先要爲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利益，在華北實行強度的工業化。新的鐵路，礦山，發電站，礦業與五金業，以及植棉業行將迅速地產生。中國民族的兩極化將受到劇烈的推動。在最短促的時期內，成千百萬的中國無產階級將被動員起來。另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將愈加依賴於日本資本。他們將比過去更不能領導民族戰爭，尤其不能領導民族革命了。那個數量更大，社會地位更強，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中國無產階級，將起來領導農村與侵略者作對。對於外國奴役者的仇恨，乃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凝固力。人們必須想到：新的民族革命會仍舊在目前這一代人的生存期間置於議事日程之上。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爲要解決這些落在他們身上的任務，必須充分融化中國革命的教訓。在這一意義上，易洛生的書能予以無可替代的幫助。現在祇希望此書能翻譯成中文與其他的外國文字。

L. T.

一九三八年，序於墨西哥，考約奧岡。

（木君譯）

希特勒與史大林

譯自美國自由雜誌

(譯者按：本文係俄國十月革命領袖托洛茨基氏應美國自由雜誌之請而寫的一篇時論，揭載於該誌本年一月號上。)

當希特勒以閃電似的速度從西邊侵入之時，史大林小心地從東邊爬進了波蘭。當希特勒臣服了二千三百萬波蘭人之後，提議終止這『無益的』戰爭時，史大林便經過他的外交孔道與第三國際，讚美和平的利益。當史大林占領了波羅的海上的戰略地點時，希特勒馬上把他的日耳曼人移轉他處。當史大林進攻芬蘭時，全世界祇有希特勒的刊物表示完全同情於克里姆宮。史大林與希特勒的軌轍是由某種內部的吸力所維繫住的。何種吸力呢？牠能延長多久呢？

學生的星球有『屬於視覺上的』，就是說，牠是外表上的；或者是『物理的』，就是真正學生的，牠構成一雙，其中一星繞另一星而行。希特勒與史大林代表着目前世界政治的空中一對真正的學生星呢？還是外表的學生星？假使他們是真正的學生星，那末誰繞誰在運行呢？

希特勒自己以保留的態度說到這個持續性的與『現實主義

的』協定。史大林則寧願在靜默中抽他的菸斗。敵對營壘中的政治家與新聞記者，把史大林說成爲主體星而希特勒則是衛星，藉以激起這兩人間的爭吵。讓我們來試行分析這個絕非簡單的問題，同時不要忘記世界政治的軌轍是不能用天體軌轍那樣的確切性來決定的。

比西歐列強的興起較晚許久的資本主義的德國，在歐洲的大陸上建設了最前進的與最富有動力的工業，但牠的建設是在業已分配了的世界中進行的。『我們要把牠重新分過』，德帝國主義者在一九一四年宣佈道。他們錯了。全世界的貴族聯合起來反對他們，而且勝利了。現在希特勒渴想在更大的規模中，重覆一九一四年的試驗。他不得不渴求這一點。德國資本主義要在牠的國家之內窒息死了。然而希特勒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即令他打了勝仗，也不能實行有利於德國的世界重分。德國起來得太晚了。資本主義到處都陷於絕境。殖民地不願意再做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戰將予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以一個有力的大推動。

希特勒對『友誼』是反覆無常，對別國民族與政府的估計則變換匪定，他破壞條約與同盟，欺騙仇敵與朋友；但所有這些都由一個唯一的目的所促成的，那目的就是重新分配世界。

『德國現在不是一個世界的強國』，希特勒在他的書裏寫着。但是『德國總須成爲一個世界強國，否則便不能存在』。把統一的德國變成稱霸歐洲的根據地；把統一的歐洲變成爭取世界霸權的根據地，因而也變成爲使美洲就範，與滅弱美洲的根據地；使美洲就範與滅弱始終是希特勒的一個不變的任務。這一目的，乃是他用以辯解他的全能政制，即在日耳曼民族內部用鐵箍來壓制階級衝突的那個政制的。

蘇聯的特點則完全相反。沙皇的俄羅斯傳下了一份貧困與落後的遺產。蘇維埃制度的使命不是要爲生產力去獲得新的領土，而是要爲舊的領土上建設生產力。蘇聯的經濟任務不需要擴張她的疆界。她生產的水準不許她從事於大規模的戰爭。蘇聯的進攻力是不大的。她的防禦力主要在於她廣大的幅員。

去年三月，在許多年誇大的官方的吹牛之後，史大林第一次在俄國共產黨的大會上談到蘇聯與西歐國家間比較的勞動生產力。史大林之所以要涉獵到世界統計中去，爲的要解釋蘇聯的人民爲什麼還生活於貧乏之中。爲要追上德國在生鐵方面的生產，蘇聯就人口而論，每年應自目前的一千五百萬噸增加至四千五百萬噸，爲要追上美國，則必須將每年生鐵的產量提高至六千萬噸，就是說，得增加四倍。所有其他的工業部門都是如此，有些甚至還要差些。在結論中，史大林希望在以後十年至十五年之間，蘇聯能追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自然，這一個時限是有問題的。不過在這時期終結之前，蘇聯牽涉於大規

模的戰爭中，無論如何，總將表示是一個武器懸殊的鬥爭。

主觀的因素，不比物質因素爲不重要，近年來也激劇地轉向於更壞的方面去。革命所宣佈的走向社會主義平等的傾向，已經給踐踏了與汙損了。在蘇聯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享有特權的個人，將一半的國民收入集中在手裏，而他們稱這個政制爲『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大約有一萬六千萬人民被官僚所壓迫，陷於悲慘的貧困之中。

希特勒與史大林對於戰爭的關係完全相反。希特勒的全能政制是從德國占有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中生長起來的。希特勒受財產所有人的委託，要以任何代價把他們的財產從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威脅中救出來，再開闢一條走入世界舞台去的通路。史大林的全能政制是從一個革命暴發戶的新階層在被絞死的革命人民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中生長起來。

戰爭對於他們兩人都是危險的。但希特勒不能用其他任何方法來履行他的歷史使命。一次勝利的進攻，許能給德國資本主義，同時也給國社制度，取得經濟的前途。

史大林則不同。他從事進攻戰爭，不能有任何勝利的希望。如果史大林參了戰，由於無數的犧牲與損失，整個官方制度的欺騙，以及牠的橫暴，必然會引起人民方面深刻的反動，這個人民在本世紀中已經幹過三次革命。對於這點，誰都沒有比史大林知道得更清楚。他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避免一次大

規模的戰爭。

史大林跟希特勒締結了聯盟，叫一切外交界的拘泥規律者與和平主義的頭腦簡單者大為駭異，其實這因為大規模戰爭的危險祇能來自希特勒，又因為照克里姆宮的估計，德國比一切可能的敵人更為強大。莫斯科去夏舉行的遷延頗久的與英法軍事代表團所作的會議，不僅是與希特勒談判的掩飾，而且是直接對於軍情的刺探。莫斯科的總參謀部顯然深信協約國對於大規模的戰爭是準備得不充分的。那完全軍事化的德國是一個可怕的敵人；祇能與她合作來實行他的計劃，才能購得她的歡心。

史大林的決心乃取決於這一結論。與希特勒聯盟，不僅能暫時間除去蘇聯牽入於大規模戰爭中的危險，而且還能獲得更迫切的戰略利益。在遠東，史大林在許多年內一再讓步，以便避免戰爭；在西疆，形勢迫他祇能奔向前去，才能逃避戰爭；不是由於放棄舊的地點，而是由於奪取新的。

協約國的報紙把形勢描寫得彷彿希特勒是史大林的囚徒，誇大了莫斯科犧牲德國而獲得的東西——半個波蘭（依人口算是三分之一），加上對波羅的海東岸的統制，再加上走向巴爾幹的開放的門戶，等等。莫斯科所獲得的利益無疑是很大的。但是最後的賬還不能清算。希特勒在世界的範圍中發動這次戰爭。從這次鬥爭中出來，德國或者成為歐洲與所有歐洲殖民地的主人，或者就是崩毀。在這樣的一次戰爭中，確保他東翼的

安全在希特勒乃是一個生死的問題。他用往日沙俄帝國的各省償付了克里姆宮。這代價難道太高了嗎？

有人說，史大林之侵入波蘭，以及他對波羅的海諸邦的壓力是欺騙了希特勒，這種說法是完全荒謬的。倒不如說，希特勒自己鼓勵史大林去占領東部波蘭與染指波羅的海諸邦，更為可信些。因為國社主義是在反蘇聯的十字軍中成長的，史大林自然不能信賴希特勒的信約。那次談判大概是在一種「現實主義的」語調中進行的。「你怕我嗎？」希特勒問史大林。「你要保證嗎？你自己拿好了。」於是史大林便拿了牠們。把蘇聯新的西疆描寫成一個遏止希特勒東進之永久的屏障那是完全不對的。希特勒按部就班來解決他的各個問題。目前的程序是要摧毀大不列顛，爲了這個目的，是能够犧牲一點的。要向東進，首先就得進行德蘇間大規模的戰爭。當此種戰爭的時機成熟之時，究竟鬥爭該從那一條子午線開始，這問題祇有次要的意義了。

進攻芬蘭初看彷彿與史大林之害怕戰爭相反。但實際上不然。在草擬的計劃之旁，還有一個局勢之客觀的邏輯，爲要避免戰爭，史大林與希特勒締結了同盟。爲要確保他自己的地位來反對希特勒，他便在波羅的海沿岸占領了許多根基地。然而芬蘭的反抗有使所有這些戰略利益減至零度，甚至有使牠們變成不利的危險。如果赫爾辛斯基（芬京——譯者）拒絕屈服，誰將出來跟莫斯科算賬呢？讀過A字的史大林，迫得非讀B字

不可。以後還得按着讀其他的字母。史大林想避免戰爭，這意思並不就是說戰爭將允許史大林避免。

德國顯然推莫斯科去反對芬蘭。莫斯科向西方每走一步，即使蘇聯更接近地牽入於戰爭之中，假使這個目的達到了，世界的局勢會大大地改變。近東與中東會成爲戰場。印度問題會立即發生。希特勒會感覺鬆爽地喘一口氣，在事變逆轉的場合中，他還能犧牲蘇聯來締結和約。莫斯科讀到德國報上友誼的文章時，無疑是咬緊了牙齒的。不過咬緊牙齒並不是一個政治因素，所以史大林還是希特勒的衛星。

德蘇協定對莫斯科有切近的利益，那是無可爭論的。祇叫德國牽住在西線，蘇聯在遠東總會覺得自由得多。這不是說，他會在遠東將取進攻的行動。固然日本的寡頭甚至比莫斯科的寡頭更不能作戰。但是莫斯科迫得非向着西邊不可，那牠就不能有在亞洲擴張的絲毫動機。在日本方面，一定以爲她從蘇聯方面會遭遇到一個厲害的，甚至是致命的抵抗。故在這些條件之下，東京一定寧願實行她海軍的政綱——不是向西，而是向南進攻斐列濱，荷屬東印度，婆羅州，法屬印度支那，英屬緬甸。

在這個基礎上成立的莫斯科與東京的協定，會對稱地補充莫斯科與柏林的協定。至於這將予美國的地位以何種影響，則此問題並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

全世界的報章，指出俄國本身之缺乏原料，於是固執地說史大林能予希特勒的經濟幫助是不足道的。然而這問題並不如此簡單。蘇聯之缺乏原料，乃具有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性質；當官僚拚命追求工業發展的高速度時，勢不能在經濟的各部門間保持一個適當的平衡。如果工業各部門生長的速度在一兩年內從百分之十五降低至百分之十或五，更如果工業生產保持在前一年的水準上，那末大量剩餘的原料馬上會出現了。另方面德國對外貿易之絕對封鎖，必然要把大量德國貨輸入俄國，交換蘇維埃的原料品。

并且我們也不能忘記蘇聯爲了防禦的軍事目的，業已貯藏了，而且還是貯藏着大量的原料與食物。一大部分這些貯藏品，乃是德國的一個潛在的供應的來源。此外，莫斯科還能將黃金付給希特勒，不管希特勒怎樣努力來建立一個閉關的經濟，但黃金還是戰爭的主要筋絡之一。最後，莫斯科之友誼的中立，使德國非常便於剝削波羅的海諸邦，斯干地那維亞，與巴爾幹的資源。希特勒的機關報『人民觀察報』在十一月二日寫道：『與蘇俄在一起，我們統制了整個東歐的原料與食糧的資源。』這不是沒有根據的。

當莫斯科與柏林間協定締結之前數月，倫敦比現在更加清醒地估量了蘇聯能予希特勒的經濟援助的意義，皇家國際事務學院對『大不列顛帝國政治的與戰略的利益』（該書序文的日

期爲一九三九年三月）作一半官性的研究，關於德蘇接近的可能性說道：『這樣的結合對於大不列顛會有很大的危險。這是成問題的』，那個集體的作者繼續寫道，『大不列顛如果不能在陸上封鎖德國的東疆，那末與德國作任何戰爭，都太難獲得決定的勝利。』這個估量值得最小的注意。我們如果說德蘇聯盟至少減少了對德封鎖之百分之二十五的効力，也許比數更大的効力，倒不是誇大的。

物質援助，還必須加添——如果這個字用得適當的話——精神的援助。在八月底以前，共產國際要求解放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阿比西尼亞，對不列顛的殖民地則保持沉默。現在，共產國際對捷克斯洛伐克保持沉默，贊成瓜分波蘭，而要求解放印度。莫斯科真理報攻擊加拿大自由之被壓迫，但對捷克人之被希特勒所屠殺與波蘭猶太人之遭受酷刑，則不作一聲。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克里姆宮現在對德國的力量還保持着很高的評價。

克里姆宮倒是對的。德國誠然不能以『閃電』式的戰爭反對英法，但沒有一個思想嚴肅的人相信過這樣的可能。不過國際宣傳上把希特勒描寫成一個被驅入死巷的瘋子，那是極端輕率的，希特勒還決不是這樣的人。富有動力的工業，技術上的天才，紀律的精神——一切都有；可怕的德國軍事機構還會表現出來。作孤注一擲的，乃是那個國家與政制的命運。波蘭政府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半政府現在法國。誰知道法國政府將來會

不會與比利時，荷蘭，與捷克斯洛伐克等政府一起避難到大不列顛去？

我一刻都不相信，像我所說過的，希特勒關於德國稱霸世界的計劃，能真正實現出來。德國的帝國主義起來得太晚了；牠軍事的怒潮會完結於巨大的災難中。但在這一災難發生之前，歐洲的許多東西會顛撲下來。史大林不願意成爲這些東西中之一。他首先要保證自己不跟希特勒決裂得太快。

協約國的刊物搜尋着這兩個新朋友間『冷淡』的象徵，每天預言着破裂。我們固然不能否認莫洛托夫在里賓特洛甫的懷抱中是不覺得快樂的。好些年來，蘇聯所有的內部反對派都被加上納粹黨奸細的罪名而遭砲烙，追迫與殺害，完畢了這個工作之後，史大林與希特勒締結了親密的同盟。現在全國有幾百萬，與那些因聯絡納粹黨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殺或被監禁的人，很相接近，這幾百萬人現在是小小的但是極其有力的鼓動反對史大林的人。此外，還得加上共產國際的隱匿的不平，這些克里姆宮的不幸的外交代理人，並不覺得舒服。史大林無疑地企圖讓另一個可能性不要閉塞。所以十一月七日李維諾夫突然間出現在列寧陵的講台上。在那天的遊行隊中，共產國際秘書長地米脫洛夫，德國共產黨領袖退爾曼的畫像都有人舉着走。

不過所有這些都是政治的外表方面，不是牠的實質。李維諾夫以及那些被帶着遊行的畫像，主要用以滿足蘇維埃的工人

與共產國際。祇是間接地史大林在讓協約國知道：在某種情形之下，他是能易馬而騎的。但祇有那些幻覺的人才能想像克里姆宮的外交政策立即就要改向了。只叫希特勒還強——他現在很強——那末史大林總還是要做他的衛星的。

一個注意的讀者會說道：所有這一切也許都是對的，但是革命如何呢？克里姆宮不計算到牠的可能性，蓋然性，甚至牠的必然性嗎？對革命的估計不會反映在史大林的外交政策上嗎？這種反對論調是合理的。莫斯科是最不會懷疑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會引起革命的。但戰爭並非以革命開始，而是以革命終結。當德國在一九一八年爆發革命之前，德國軍隊業已予沙皇制度以致命的打擊。以同樣的方式，目前的戰爭能在某個國家內爆發革命之前很久，便摧毀了克里姆宮的官僚制度。因此，我們對於克里姆宮外交政策的估計，是不涉及革命前途的力量。

不過，爲要正確地指出莫斯科未來的詭計以及牠和柏林的關係的發展，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克里姆宮想不想利用戰爭來進行世界革命，假使如此，那末怎樣辦？十一月九日，史大林認爲必須以最鈍拙的方式來否認這種說法，即是說他想「儘可能地延長戰爭」，一直到參戰者都精疲力竭爲止。『在這場合中，史大林是說了真話。他絕不願意有一個長期的戰爭，理由有二：第一，牠必然要將蘇聯牽入漩渦；第二，牠必然要在歐

洲引起革命。克里姆宮害怕這兩者都是很有理由的。

倫敦皇家學院的研究員宣稱：『俄國的內部發展趨向於樹立一種管理員與官員們的「資產階級」，他們擁有很多的特權，足使他們完全滿意於現狀……歷次清黨，我們可以將牠們看成爲一個過程的幾個部分，這過程要把一切想改變現狀的人統統清除出去。這樣的一個解釋，使人更加相信俄國的革命時期業已過去，此後牠的統治者祇將設法保持革命所帶給他們的獲得品了。』

這話說得實在好！兩年餘前我在『自由』上寫過：『希特勒正在反對法蘇聯盟，因爲他要自由地能與莫斯科聯盟來反對巴黎。』那時，這幾句話被人解釋爲一種有成見的見解。事變却證實了牠。

莫斯科懂得很清楚：大規模的戰爭將產生一個政治社會的大反撥時期。假使莫斯科的人真正希望操縱革命運動，且把革命從屬於他們自己的利益，那末史大林自然會歡迎革命的。但他懂得革命是官僚制度的對立物，牠將無情地掃除特權的保守機關。克里姆宮的官僚黨羽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中，在一九三一至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遭受了怎樣悲慘的失敗呀！在新的革命潮浪之上，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必然會發生出來，牠將捲去共產國際，予蘇聯民族墮墮內的蘇維埃官僚以致命的打擊。

西班牙事件的教訓怎樣地不甚爲人所了解，這是可驚的。

希特勒與莫索里尼竭力要利用西班牙的內戰來造成反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四強同盟，史大林爲了抵禦起見，便給自己立下了任務：要證明給倫敦與巴黎看，他比佛朗哥及其撐腰者更能剷除西班牙與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誰都沒有比史大林更無情地宰殺了西班牙的社會主義革命，那幾天他是純粹民主主義的最高天使。什麼東西都動用了，進行瘋狂的誑騙與羅織，依照莫斯科審判的精神作司法的偽造，有系統地屠殺革命領袖。反對工農奪取土地與工廠的鬥爭，自然是在反「托洛次基」主義鬥爭的名義下進行的。

西班牙的內戰值得作最精細的注意，因爲在許多方面，牠乃是初步世界大戰的一種演習。無論如何，史大林是完全準備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重演他西班牙的所劇的，他這次希望更能成功地購得未來勝利者的友誼態度，他購買的方法就是證明給他看，誰都不能比他更能鎮壓赤色怪物，這怪物爲了名稱上的便利起見，還會加上「托洛次基主義」的標記的。

五年來，克里姆宮進行了一個贊成民主各國聯合的運動，爲的可以在最後時機，將他們對於「集體安全與和平」的愛出賣給希特勒。共產國際的職員們接到了命令：「向左轉」，於是立刻從檔案中發掘出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老公式來。這一新的「革命的」迂迴，多半會比「民主」時期爲短，因爲戰時大地地加速了事變進展的速度。但史大林基本的策略方法還是同樣：他把共產國際轉變成一個對明天的敵人的一種革命威脅，

以便在緊急關頭用作一種有利的外交拉攏的交換品。史大林沒有絲毫的理由來害怕勃勞特或他這一類人的反抗。

克里姆宮經過牠順從的記者，恫嚇着說如果意大利與日本參加英法方面，俄國將站在希特勒方面參戰。同時要努力使德國蘇維埃化。（例如見十一月十二日紐約泰晤士報的莫斯科通訊。）驚人的招供！克里姆宮「勝利」的鐵鏈，已經將牠那樣緊密地束縛在德帝國主義的戰車上，以致希特勒的可能的未來敵人，也自然而然地成爲史大林的敵人了。史大林之多半將在第三帝國方面參戰，便及時以使德國「蘇維埃化」的諾言來作掩飾。照加里西亞的方式嗎？要達到這一步，只須用紅軍占領德國好了。經過德國工人的暴動來完成嗎？但如果克里姆宮想利用這個可能，爲什麼要等意大利與日本參戰呢？

這篇投意的通信的動機是顯然的：一方面恐嚇意大利與日本，另一方面恐嚇英法——藉以避免戰爭。「不要把我推到極端，」史大林恫嚇着，「要不然我要做出可怕的事情來了。」這句話裏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虛聲恫嚇，也許有百分之五是糊塗的希望：也許在致命的危險中革命會來搭救他。

史大林之使德國蘇維埃化的思想，與張伯倫希望在德國恢復和平保守的專制是一樣的荒謬。只有一個新的世界的聯盟才能在一次前所未聞的大戰中摧毀德軍。全能政制祇能由德國工人階級方面的大進攻才能加以毀滅。他們之進行革命，當然不

是爲要用一個霍亨索倫氏或史大林來代替希特勒。

民衆之戰勝納粹黨的專制，將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炸發之一，且將迅速使歐洲改觀。覺醒，希望，熱情的浪潮，將不會在蘇聯密封的邊疆上停止的。蘇聯的民衆仇恨那貪婪的與

希特勒的綱領

「……德國正在利用戰爭實現牠的綱領。藉英國之助，她不顧法國的反對而重整軍備。藉波蘭之助她孤立了捷克。藉蘇聯之助，她不僅要臣服波蘭，還要摧毀那些古老的殖民帝國，假如德國藉克林姆宮之助得以從當前的戰爭的戰爭中躍而爲勝利者，則這件事將表示對蘇聯是一個致命的危險……」

「……希特勒的政策如下：把一次一次的征略立成一個固定的程序，而每次新的征略，總創造一批新的「友誼」。在現在的階段上，希特勒把大烏克蘭暫時寄存在他的朋友史大林的手裏。在第二個階段上，他將提誰是烏克蘭的主人，是史大林呢，還是他——希特勒，這個問題了。」

「……希特勒利用波蘭的戰役把史大林網在他的戰車上，剝奪他運用詭計的任何自由，使他聲名狼藉，而且順便殺死了共產國際。沒有一個人會說希特勒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每個人都說史大林已成了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

（壽摘自『德蘇協定的前因後果』。）

殘酷的統治階層。他們的仇恨祇因想到帝國主義在何隙而乘所
以才抑制下去。西方的革命將奪去克里姆宮寡頭們政治存在的
唯一權利。假使史大林比他的同盟者希特勒壽命長些，那他也
不會很久的。

（鳳岡譯）

論爭的良心

壽

記得列寧會嘆過這樣的氣：要找一個有良心的論爭對手很難。這確乎是實情；但是事到如今，最不講「良心」的論爭家偏偏是那些自命爲「列寧門徒」的人，這真是歷史向人類開的一個最惡毒的玩笑！

遠的不說，這兒且談談關於本集搜入的那篇『中日戰爭與中國革命』所引起的喧嚷。這原是L·T·君在易洛生氏中國革命史上所寫的一篇序文，幾月前，會有人把牠的末一段載於某一刊物，不料被一些『史家』朋友見了，竟如獲至寶，當作『某派』罪狀的『鐵證』。

差不多在所有中共出版的最近刊物上，你可以看到如下的『引文』：某派『希望抗戰失敗，希望日帝國投資開發中國產業，以便在將來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

究竟L·T·君的文章裏有這樣的見解沒有呢？全文具在，請讀者們自己尋找吧。如果發現不出這種荒唐的意見，那又不過又證明一次『史家』朋友的造謠慣技，與這班人之缺乏『論爭的良心』吧了。

論游擊區的經濟基礎

柯大章

武漢的陷落，是抗戰過程上的一個明顯的分水嶺。在此以前，一般說來，抗戰的主要活動是軍事鬥爭，這表現於事實的是淞滬的大戰，台兒莊的大戰，與保衛武漢的大戰。自武漢陷落以後，敵人因為想穩定廣大的佔區而享受侵略的果實，故在軍事上採取守勢，而致力於淪陷區的安定與開發，我們方面則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略，以消耗敵人的兵力與物力，使敵人無法穩定與開發淪陷區。換句話說，自武漢失陷後，抗戰的主要活動即離開大規模的軍事鬥爭，而轉入了以經濟鬥爭為本質的游擊鬥爭。

武漢陷落後不久，日本軍閥即提出了在中國『以戰養戰』的口號，而這時候召開的國民黨大會與共產黨大會上，也都着重地說明了此後要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略。這樣決定與此後一年半以來由此決定所產生的敵我的行動，都表示在當前抗戰階段中，以經濟鬥爭為本質的游擊鬥爭，關係怎樣重大了。本文的目的在於就一年多來各方面的事實研究游擊區與敵區鬥爭的經濟特性及其前途，至於與此無關的其他情形，都不在本文論及之內。

(一) 以游擊區為中心的敵我經濟鬥爭

一年半以來，我們在各游擊區中怎樣和敵人作經濟鬥爭呢？要說明這一點，須先說明敵人怎樣向我們作經濟的進攻。日本人對於游擊區所作的經濟進攻的情形，可分四點來說明：

第一點是以各種手段強佔各大城市的機器工廠，製造工業品向游擊區推銷。例如，在山西，他們佔去大同與陽泉的煤礦與鐵礦外，又佔去榆次的紡紗廠，晉華捲烟公司，汾陽臨汾等地的麵粉公司，新絳的紡織廠，太原的兵工廠，西北洋灰廠，鍊鋼廠，毛織廠，皮革廠，印刷廠，這些工廠都早已開工。在平津一帶，所有從前國人經營的各工廠，均已落在日本人的『興中公司』及『華北實業開發會社』之統治下。在長江流域，他們以實行沒收，或強制『合股』等方法，佔去了上海租界以外及滬東區中的各華人工廠，及蘇州、常州、無錫、鎮江各處的已燬半燬或未燬的各華人工廠。這樣佔去了各工廠以後，他們就可以以廉價商品向各游擊區侵略，吸收原料，換取法幣，而企圖破壞游擊區的經濟對抗。

第二點是以各種手段向各游擊區推銷日貨及冒牌日貨，以圖吸取法幣與農產原料。被強佔的各華人工廠的出品，多半仍用原有的商標向游擊區推銷，至於純粹日本貨物，則常冠以中

國貨或外國貨名號而到市場混銷。例如，在上海的日本人經營工廠，向中國商人推銷貨物時，不但價錢較廉，且可隨中國商人的意代為製造各種牌號，幾個著名大公司在此方法下所購進銷出的日貨，據說數量很大。在山西，日貨像潮水一般地湧進，上面所標的大都是『中國製造』，『純粹國貨』，『上海製造』，『美國製造』等字樣，日偽設立的『晉北實業銀行』除以貸款方式向淪陷區榨取外，又向淪陷區及游擊區大規模推銷仇貨，吸收國人的血汗。已失陷的各大城市，如南京、蘇州、杭州、蚌埠、濟南等，到處都充滿着日貨，成為日貨向游擊區及淪陷區推銷的總站。日本人為想加速消滅我們的游擊區，也曾封鎖某些淪陷區城市的工業品對於游擊區之輸出，例如過去在太原，他們就不准貨物運往游擊區，在河北，也曾對游擊區施行過經濟封鎖，但他們或許是故意不嚴密，或許是無法嚴密封鎖，故這種限制往往只是表面上的。

第三，日本人向游擊區推銷日貨或冒牌日貨的目的，是吸收法幣與原料，然購買原料時他們參用着偽幣，因而推銷日貨的最後作用之一就是破壞游擊區的法幣。一年餘來，各游擊區與敵人的最激烈最普遍的經濟鬥爭現象之一，就是法幣抵抗偽幣的鬥爭，這一鬥爭，在無論那個游擊區都無時不在進行中。貨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尺，鬥爭之如此激烈與普遍，就表示一年餘來敵我的經濟戰爭是怎樣激烈。日本人破壞法幣的手段很多：他們在各淪陷區中強迫沒收法幣，換以他們所特製的聯

銀偽幣及華興偽幣；又嚴禁使用法幣及舊時省幣，期使偽幣成為通行之幣。然這些辦法都禁止不着法幣的流通，於是他們退一步准許偽幣與法幣同時使用；而這辦法已在各淪陷區中有效了。然經濟的統一性是不易割斷的，游擊區與淪陷區的商品交易既無法絕對停止，則偽幣在淪陷區流通後就不免要多少流入游擊區，而游擊區中的一部分法幣不免為吸取而去。但因為淪陷區人民之信仰法幣及游擊區之嚴禁偽幣流入，故直到現在，偽幣在淪陷區中的勢力還不及法幣，更不必談在游擊區中了。日本人為擴大偽幣的勢力，又對農民施行貸款，以施小惠而推銷偽幣，又偽造法幣或省幣以圖混入游擊區而換取法幣。例如，華北的三個偽銀行——察南實業銀行、晉北實業銀行、蒙古聯盟實業銀行，對於華北農商均已作了巨額的貸款，單以晉北實業一家而言，在廿七年後半年中已放出了農業貸款二十四萬餘元，商工金融貸款十六萬餘元，一般金融貸款九萬餘元。又如，在二十七年前半年，日偽知道了聯銀偽幣難於侵入，因即偽造了河北省銀行的五元及十元省幣，企圖大量向冀中侵入。有一時期在晉冀察邊區各縣中，也曾發現大量偽製的河北省幣及中中交各行法幣。

第四，在日本人竭力破壞法幣，輸入仇貨並霸佔各淪陷城市的機器工廠之時，他們又對於各淪陷區的農產品實行產銷的統制。例如，在長江下游一帶，他們在總機關華中開發公司下，設立了各種子公司，以統制華中的海產、蠶產、繭絲及水

陸運輸等。他們又在長江淪陷區及一部分游擊區中收買稻米，造成了許多產米區米價極昂的恐慌。在華北某些地方，他們曾舉行植棉放款，棉田登記，以特定價格統一收買棉花等。在山東，他們的大連鹽城銀行以特定限價收買烟台的水菓。敵人的這種統制手段，自然首先影響到淪陷區的物價，使物價在他們的剝削之外，須與國外市場，尤其是日本市場發生聯繫，換句話說，就是在目前戰雲濃罩下的遠東物價一般高漲期間，這種統制手段自然要提高各淪陷區的農產品價格，因之日本人與奸商都不免要以高價收買游擊區的農產品，而區中的地主與富農之向以出售農產品生活者，此時不能完全擺脫這種高價收買的引誘。在這種情形之下，敵人對於淪陷區的經濟統制及貨幣手段等，自然要影響到游擊區的經濟生活。

爲對付敵人的這樣各方面的猛烈而長期的經濟侵略，在過去兩年多，我們的各游擊區——晉冀察邊區游擊區，晉東南游擊區，冀中游擊區，魯南游擊區，蘇北游擊區，皖北游擊區，江南游擊區，都執行了一種經濟抵抗的戰略。因爲無論在華北華中，敵人的經濟進攻戰略，與進攻目的都相同，所以各游擊區的經濟抵抗戰略也都不謀而合。這戰略可以兩句話包括之，即：一方面封鎖或嚴密統制與淪陷區的經濟來往，一方面發展手工業與農業，以圖本區的自足自給。茲分述之如次。

封鎖或嚴密統制經濟來往的目的有四點：（一）斷絕敵人吸收本區的糧食與原料；（二）杜絕仇貨的輸入；（三）防止

偽幣的流入與法幣流出；（四）於必要時從淪陷區吸收本區不產的必需品。

例如，冀中游擊區，在廿七年八月以前，已普遍禁止以區內糧食棉花運往區外，並禁止與敵人通商，以斷絕敵區糧食的來源而避免區內的資金外流；後來，自從發現偽幣流入之後，即迅速設法防範，禁止該幣入境，其已流入者則鼓勵商人赴保定平津購買應用物品，悉數用去。在山西，自二十七年臨汾失陷後，省政府即頒布了『抗戰期間經濟設施方案』，其中有嚴禁日方貨幣的流通，嚴禁買賣仇貨的規定；又設立貿易局，統制輸出輸入的商品，以防止敵貨之輸入及糧食之運往敵區，凡犯此禁令者，均處死刑。在山東，省當局也針對着日人的經濟侵略，而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對策：第一，設立民生銀行，發行民生銀行省幣，以換取法幣，而以法幣作爲省幣的準備金，使敵人無法套取；第二，舉行棉花糧食生產量的預先登記，嚴格限制運輸此項產品到日人佔據的城市。在蘇北與皖東一帶，游擊區當局亦禁止糧食出口，禁止日貨入口，並獎勵農民儲糧，因此現時蘇北皖東一帶的農村中，都備存有大批糧食。江蘇省政府當局，爲了打擊偽幣，爲了軍隊便利，爲了增加地方的抗戰力量，及維持行政系統的永續，曾准許該省淪陷區各縣政府印製五角、二角、一角的兌換券，用以完糧納稅，一面以救濟財政與金融的困難，一面以防制日人的套換法幣。至於在江南一帶的新四軍游擊區域中，嚴禁糧食運往敵區及抵制仇貨抵制

偽幣的混入之同一經濟戰略，當然也是施行着的。

然就貧乏零碎的材料看來，各游擊區的經濟戰略雖然大體相同，然各區之間亦有差別，這差別就是：某些游擊區似乎絕對斷絕與敵區的經濟往來，而某些游擊區則只對此經濟往來施行嚴格限制，而並不斬斷與我有利的敵我之間的買賣。前者，例如魯南游擊區；後者，例如晉冀察邊區游擊區。魯南游擊區，包括泰山、蒙山、徂徠山、沂山、抱犢固一帶的山區，南北長約五百里，深山重疊，山裏礦產豐富，各種糧食與棉花，也均足自給，在這區域裏，一切日常必需物品，尚不感缺乏，然因我們自己的封鎖及日本人的反封鎖，這裏與區外市場斷絕了供求的關係。但在晉冀察邊區中，資源條件或不若魯南一帶的優越，似乎就因為這點，所以該區並不與敵區絕對斷絕經濟關係。該邊區最高負責人胡仁奎氏曾說：『有人這樣想：敵我不共戴天，根本不應再有經濟往還，我們應該用法令的效能，與敵斷絕貿易。我們覺得這是不合事實的想法，違反商業滲透性的想法。實則在游擊區裏我們還有必不可少的物品，需要從敵區吸收進來，還有願意推銷的物品，需要運入敵區去，真正斷絕貿易，未必完全與我有利。』（見『戰地知識』一卷二期上，胡氏所作『論游擊區經濟的特性』一文）。由這些話看來，可見晉冀察邊區的經濟戰略之這一特點了。大同之中的這樣小異，是無足怪的；各地的經濟條件不同，經濟戰略自然不能完全相同。例如，皖西北是目前華中區的游擊戰中心之一，是皖

省政府的所在地，但那一帶平素出產糧食很少，食鹽又完全依賴區外輸入，故即在目前已有餓死人及平民兩三月不嘗鹽味的事情發生着；如果叫牠完全與區外斷絕貿易關係，則那裏自然不能長期進行游擊鬥爭了。

上面說的是各游擊區封鎖或嚴密統制與淪陷區的經濟往來的情形。但要想長期進行游擊戰，要想真能抵制住仇貨的侵入，單只封鎖或統制經濟往來是不够的，封鎖或統制的消極手段之外，還必須提倡發展本游擊區的生產，以圖能充分自給，並抵抗得住敵區的優勢經濟的攻侵，此因，各游擊區於消極的封鎖或統制之外，又一致採行積極的戰略，即提倡並發展本區的農業與手工業，在資源貧乏而糧食與物品的產量素不足自給的游擊區中，尤其是如此。例如，山西的『抗戰期間經濟設施方案』中，於禁止日偽幣及仇貨之侵入外，即特別着重於發展農業與手工業的規定，如：發展手工業；由各縣動員委員會幫助人民組織手工業團體；以預先定貨的方法鼓勵手工業生產；開闢未經開墾或因地主死亡而致荒廢的土地等。又如冀中區，在開始禁止與敵區通商時，即發起土貨運動，設立土布工廠、肥皂廠、土法製紙廠等，以便日用品均改用土貨。這樣發展手工業的運動普及於各游擊區，而國民政府的經濟文件與當局言詞，亦曾不斷指點着這個方向。

這便是以游擊區為中心的敵我經濟鬥爭之一般現象。

（二）游擊區的經濟特性

由以上種種現象，我們可以看出游擊區經濟的幾點特性。但各游擊區，與後方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關係有疏密之不同，對當地的地主富農的依賴性有程度的不同，因而對待他們的態度亦有寬嚴的不同，所以在論其經濟特性時，並由此特性而論斷其前途時，各區不能一概而論。但在八路軍完全影響下的晉冀察邊區，是組織上與政綱施行上最成熟的游擊區，是一般政論者所景仰膜拜的游擊區；其他各區與牠雖有差別，但在政論者的頭腦中是想叫牠們依照牠的標準去發展的，因此，我們在論游擊區的經濟特性及其前途時，即以晉冀察邊區作為分析的標準。那麼，游擊區的經濟特性怎樣呢？

首先，游擊區的交通是，或企圖與淪陷區隔絕的，作游擊戰基礎的農村經濟不能與淪陷區的城市經濟相調劑，或極難相調劑（假如像晉冀察游擊區那樣，允許與敵區維持相當貿易關係的話）；與我們自己後方的交通，也多少隔斷或甚而完全隔斷了（如魯東南），即隔絕程度不大，但因與後方的交通關係本就落後，故也不能抵消該區因與淪陷區隔斷所產生的經濟後退性。因之，游擊區的總經濟趨勢不得不向以本地方為單位而力求自給的道路走。加之偽幣與仇貨的不斷侵略，游擊區不得不採行對抗的政策，而限制或完全斷絕與敵區的商業關係，因之更人為地加重了這種本地單位的自足自給的趨勢。然游擊區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游擊戰爭，因之每個游擊區中都存在着幾種戰時的現象，如秩序的不定，資金的逃走（隨地主富農之逃亡

而逃走），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不易或甚而無法進行。例如晉冀察邊區，是現有各游擊區中最鞏固、最穩定、面積最大、受戰災毀壞最輕的游擊區，然其最高負責人胡仁奎氏在上引論文中曾寫道：游擊區『經常在戰鬥狀態中，敵我戰線犬牙交錯，變化不定，人民居處無常，不易找到安全地區，而建立工廠工業（偶有建立，反成敵人蹂躪目標）需要較長時期的工程，當然不易舉辦』云云。晉冀察區尚如此，則其他游擊區的情形，可想而知了。這使游擊區的經濟生活，不得不退到原始狀態的自足自給生活，在某種生活必需品缺乏（如糧食，食鹽）的那些游擊區中，也不得不設法力求自給。

在這種情形下，游擊區經濟的一般現象，是本地農產品價格低落，手工業品多少代替了城市無法輸入的工業品。例如在山東游擊區中，荳油、旱烟、火石、土布，代替了煤油、紙烟、火柴、洋布；小麥每石三元，小米每石二元多，高粱每石一元七八角，較戰區後方各城市，低三倍至二十倍。

所以，游擊區的經濟特性的第一點是：牠是建立在人為地已脫離大城市或要想脫離大城市而走向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之基礎上的。

然而，在中國農村經濟已日趨資本主義化的現在，要使農村經濟人為地脫離大城市而退回到自給自足的階段，是違反經濟發展的自然道路的，因之，要想這種不自然的手段施行有效，那就必須憑藉政治的力量，換言之，即以政治力量去強制

執行。如，爲要限制仇貨的輸入，就必須在游擊區邊境上設立關卡；爲要避免區內地主富農以原料糧食資財，對於竟而資敵者就必須以刑罰懲處；在敵軍來攻而我軍退却時，就必須以軍事紀律處理存儲的糧食。又如，中國農村中已經完全商品化的農產品已不在少數，如河北的棉花，山東的烟草等；爲要使一向依靠這種商品之生產與運輸以爲生活的富農或地主資本家拋棄其舊生涯，就必須用政治的甚而軍事的強制辦法。那麼，這種政治的與軍事的強制辦法是在誰的領導下施行呢？就晉冀察邊區這個模範區說：領導施行上述強制辦法的份子既非大資產階級份子，也非地主與富農份子。因爲這個游擊區，大體上說已與大後方的城市大資產階級相隔絕了，雖還在牠的意識與政令的籠罩下，然行動已無法受其領導；而這些強制施行的辦法，雖未動地主富農的土地所有權的分毫，雖仍依據在舊財產關係的基礎上，但與地主富農的當前利益是完全違背的，所以不會受他們的領導。至於貧農，在游擊區中所獲得的最好的生活改善條件，不過是區當局仲裁下的二五減租，完全處在地主與軍事當局的壓迫下，則他們當然亦非領導這種辦法的施行的人。所以，分析到最後，領導這個游擊區的鬥爭的，只有在民族意識籠罩下的小資產階級了。至於晉冀察邊區以外的其他各區，其與地主富農及後方資本家的關係越密切，則這種強制辦法的嚴正性便越減少，其與敵區妥協的傾向便越明顯，而離開一般政論者所想像的游擊區景色就越遠，這些區域，不在我們

所分析的標準之內。

所以，游擊區經濟特性的第二點是：牠是建立在民族意識籠罩下的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政治與軍事強制之基礎上的。

但是，農村的向來統治階級是地主與富農。現在這些舊統治層在游擊區中處在什麼地位呢？考察這一點，更可見出游擊區是建立在民族意識濃厚的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特性。戰爭以來，游擊區中的地主與富農的統治者，凡能逃亡的，都逃亡到臨近的大城市中去了；其不能逃亡或已失掉逃亡的機會以致無路逃亡的，則仍侷促在鄉村之中，而於游擊區未鞏固以前成了所謂兩面派：『日本軍隊來，打鞭炮歡迎，弄些婦女去慰勞皇軍；中國軍隊來也打鞭炮。這種兩面派主持了一切，與日寇互不侵犯，企圖苟安，妥協』（項英：『新四軍一年來抗戰經過與教訓』）。到游擊區的政權相當鞏固以後，這些兩面派就銷聲匿跡，而偽政權的影響也同時在鄉村中消失。但他們是心悅誠服地擁護游擊政權的麼？當然不會是的，因爲游擊戰爭與他們的利益相矛盾，在實行二五減租與減少高利貸剝削的地方，他們當然不高興作這樣讓步；在區當局爲了戰爭的必要而不得不相當實行『財產較多或所得較多者其納稅亦較多』的規定的地方（如在晉東南游擊區），他們當然也不高興負擔這樣的担子；在因交通斷絕而農產品不能運出的地方（如魯南），他們的剝削與牟利的活動即陷於停頓，這當然亦非他們所甘願；在受政治壓力而不得不把向爲他們的利源的種植棉花改變成爲無

利可圖的種植糧食，這當然也是與他們的利益衝突的。固然，在各地的地主富農階層中也有民族意識濃厚，寧願犧牲自己利益而對民族鬥爭効力的分子，但這終究是極少數，不能改變該階層的整個趨勢；因之，在我們眼前所出現的，十九是些痛心的事實：例如，在江浙的某些淪陷城市中，常住有不少的逃難地主與富農，他們與鄉村的不良游擊隊勾結，藉勢在鄉間收租糧，收得之後則幾分之幾地瓜分！在游擊隊限制鬆弛的地方，游擊區的地主富農與城中的偽維持會有親密的來往，因為維持會的主持人也是地主富農隊伍中人！由這樣情形看來，向為農村經濟統治者的地主與富農現在在游擊區中處於什麼地位呢？處在農村經濟已被戰爭破壞或阻礙而無法恢復的時期，處在游擊當局的軍事與政治的壓力下，處在敵人在城市中的統治尚未形成一種足以引誘他們的力量時候，處在不得不忍氣吞聲暫時受痛的狀態中。這種情形在晉冀察邊區中最明顯，最典型化。然而不能斬斷的經濟生活的河流，即在強制阻礙之下也只能暫時停滯一下或後退一步，是決不能長期被斬斷的。

所以，游擊區經濟特性的第三點是：牠是處在農村的原來統治者——地主與富農——還未能從戰爭摧毀中找到恢復道路之空隙間。

就上述三點看來，可知要把已經資本主義化的鄉村經濟強拉回到自給自給的原始狀態，是一種違反自然發展的行為，是一種大的鬥爭。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軍事政治壓力，外須不斷

抵禦敵區的經濟侵略，內須消除地主富農的反抗企圖，並須設法維持並發展能支持長期抗戰的經濟力量，這也是一種大的鬥爭。固然，任何經濟活動都帶有鬥爭性，都是在鬥爭過程中，然游擊區的經濟鬥爭，更急迫，更劇烈，最含有時刻發生的急劇變化的可能性。

所以，游擊區的經濟特性的第四點是：牠是時刻在劇烈的不穩定的鬥爭過程中的。

(二) 游擊區經濟的前途

從上述幾點特點看來，傾向於自給自給的游擊區經濟天然要發生如下的幾種現象，即：游擊區農村已脫離了或正想叫脫離淪陷區中的大市場；由於地主富農中農的土產不能輸出，於是土產品價格大跌特跌，地主富農中農以至貧農的購買力，都大大減低；不出產或出產甚少日用必需品（如食鹽，糧食等）的區域，則一般生活，尤其是下層農民的生活，都不得不陷於淡食與飢餓等悲慘狀態。在這中間，中農以上的生活狀況固是苦了，然而最苦的則當然是無土地的貧農；因為在自給自給狀態中，資本主義的分配形式減低了作用，土地成了最主要的甚而惟一的生活工具，而貧農則並無土地；再則，貧農平時是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的，但這時候農產品既不值錢，地主富農就要縮小生產，於是而貧農便有失業的危險。梁漱溟於去年以八個月的長時期，遊歷了皖北、蘇北、山東、冀南、豫北、晉

東南各地之後，在重慶發表感想說，各區的民衆經濟狀況『一般說來是苦得很，雖是照往常一樣的耕作，而生活或許比抗戰以前更要苦。』——一般比抗戰以前更苦，是各游擊區中的當然現象，然在這個『一般比以前更苦』的現象下，也當然包含着下層農民比上層農民更苦的事實。

從游擊區的這種經濟現象及上述政治現象所可得出的必然歸趨是：假如一無所有的生活更苦的貧農，還能在游擊軍事統治之下忍受抗戰的重壓，那地主富農便比較不能忍受。爲什麼？因爲他們有田地房產要保護；因爲他們掌握過農村經濟的統治權，不願見這種權力歸別層小資產階級份子操縱，而讓自己蒙受不利；因爲他們過慣了比較優裕的生活，受不了游擊區中的自足自給式的退後生活。因此種種理由，他們雖然現時迫於環境，不得不忍受一時，然他們是時刻在尋找反抗當前軍事統治的道路的，時刻在盼望着區外的援手的——如是中國的當然更好，如是日本的也沒有什麼。在敵我兩方勢均力敵時，他們就在這中間扮演成『兩面派』；在敵軍佔領區域中，他們就變成『維持會』委員之類；在游擊區中，他們暫時忍受痛苦，然如外面有好出路的幻景來引誘他們，他們決不在乎演『裏應外合』。所以，就農村各階層的利害關係看來，現在忍氣吞聲地處在軍事統制之下的地主富農，是最有可能毀壞游擊區的因子。

誰能够制止他們的毀壞呢？目前掌握統治權的，在民族意

識籠罩下的區內小資產階級軍事統治者，把牠的統治大半附依在地主富農一邊，小半附依在中農以至貧農一邊；對於前者，牠替他們保持着統治的基礎（以便遇有機會時好讓牠們來打倒游擊區，恢復其統治！），並且即以此作爲游擊區的經濟社會基礎；對於後者，牠以『二五減租』，『合理分擔』作餌，以圖取得擁護，並冒假他們的聲勢以威脅前者使不得不暫時低首。這種統治力量是很不鞏固的，很容易被地主富農所摧毀的，當然無力制止地主富農的毀壞游擊區。不但如此，小資產階級份子的這種統治，只是暫時的，無法鞏固的，如貧農不起階級發生更密切的聯繫，則他們不久就要完全受地主富農的支配。中農以至於貧農有力制止地主富農的那樣反動，及小資產階級的這樣動搖性沒有呢？一般說來，農村階級的下層，貧農，是農村中最革命的階層，最有力量與一切反動勢力鬥爭的；歷史上，他們在蘇聯能够幫助無產階級排除俄國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擊退了各帝國主義的聯合圍攻；在中國過去的內戰中，他們在江西以十萬武器惡劣的軍隊，抵抗五十萬武器精良的政府軍的圍剿到五年之久。所以，貧農的力量如果真能解放，則不但制止地主富農的反動不成問題，即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都不困難。可是，現在他們是處在怎樣困難的境况中呵！他們身受着抗戰在農村中所產生的痛苦的十分之五六，他們的生活比抗戰以前更苦，他們處在游擊區統治者與地主富

農的雙層壓迫下，他們對於抗戰的態度很冷淡；無人領導他們去作生活改良的鬥爭，而掛革命招牌的領導者，又以仲裁辦法阻礙他們鬥爭。在如此狀態下，貧農是不能制止地主富農的反動的。

因此，在這裏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說，游擊區既無堅定的經濟基礎，亦無堅定的階級基礎，其存在是極不鞏固的；而游擊區前途上的最大危險是牠會被舊時統治者勾結日本所叛賣，而目前軍事統治者的動搖性，更加重了這樣的危險。

再由敵人目前對於游擊區的進攻方法看來，更可見這點危險的嚴重。日軍在以前對我軍進攻時，大都以陣地戰方式憑着強烈的火力前進。但去年四月至六月的進侵晉東南的戰事中，他的方法不同了：他的進犯軍隊中，偽軍人數竟佔全體四分之三。每占領一重要據點，立刻即做碉堡，築工事；同時並竭力修築公路大道，以聯絡其後方交通，然後再穩紮穩打，龜步前進，但有機可乘時，亦作突擊；如第二步進攻不能如願以償時，即仍退守第一步。日軍從前作戰多恃重武器，然此次在晉東南戰爭，則減少重武器，增加輕便自動武器，或僅帶小型山炮及迫擊炮。換言之，日軍現時對我游擊區的進犯，已採用過去我國內戰時的緩進圍攻的戰略。然而過去的被圍攻者，是以貧農作戰鬥的基礎，故能作長期的抵抗，而我們現在的游擊區中並無如此堅強的戰鬥基礎，且有可怕的地主富農的內奸！這不是很嚴重的危險嗎？

況且游擊區與敵區的經濟關係，事實上在許多地方是無法根本斷絕的。例如，在晉冀察邊區，由於『商業上的運轉最含滲透性，所以和敵人強佔的大城市間的商業往還，仍極頻繁。』（胡仁奎：『論游擊區的經濟特性』）。上海字林西報的通信也說：『說來未免奇怪，淪陷區與（晉冀察）自主區之間還進行着十分活躍的貿易。』（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號的該報週刊）。並且，大概由於要避免經濟根本斷絕後的難堪的苦痛吧，這個游擊區當局還把那主張根本與敵區斷絕貿易的意見，斥作『不合事實的想法，違反商業滲透性的想法』。又如，綏德是八路軍在陝北的重要根據地之一，他們的組織與檢查手段，都較別的集團為嚴密，則這裏對於與敵區商業的隔斷，應該是最著成效的地方了，然而就是這個城關，竟滿布着由太原來的洋布、綢緞、舞襪，及五光十色的鈕扣別針，並且在河東西交通要衝的磧口鎮與三交鎮，街上的商店裏也滿是各種各樣的偽貨與仇貨（峒井蠟紙、真空管自來水筆、東洋便箋之類）。而陝北當局好像對這些洋貨之『滲透性』也特別默許，並不嚴厲取締。陝北雖非游擊區，然這情形，很可以作一般游擊區經濟情形之好例子。按之經濟鬥爭中的定律，進步的經濟總是能戰敗落後的經濟，所以資本主義化的城市經濟總是能臣服封建式的鄉村經濟；那麼，在目前狀況中，游擊區的落後經濟（加上人爲的回向自給自足的方式，就更落後了）既不能並且有人還不主張與敵區的城市工業經濟斷絕關係，則今

後怎能抵抗得住敵區的高度經濟的打擊力量，不是很成問題的嗎？這種高度經濟的侵入，不管別的作用怎樣，但對於煽燃地主富農的恢復統治權與排除新來的軍事壓力的慾望，是必然的。而且這種作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皖北、蘇北、山東、冀南、豫北、晉東南的長期考察者梁漱溟說：『廣大農民要生活，只有依靠出售他們的農產品，政府嚴令不許資日，日人却在出重價收買。希望政府以非凡的毅力來解民倒懸。』這話明顯地表達出有許多游擊區已覺得支持不住敵人的經濟壓力了，尤其是地主富農已準備接受敵人的經濟引誘了！）。所以，游擊區與敵區的這樣經濟關係，將要成爲地主富農叛賣游擊區的主要誘因，及游擊區被毀的起點。

由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現在各游擊區的經濟是建築在非常脆弱的經濟的與政治壓力的基礎上，因而游擊區的基础非常不鞏固，即能抵禦得住敵軍的單純軍事力量的進攻，也很難避免經濟上的自然敗北，更難防止地主富農的叛變降敵。這種不可諱言的危險局勢，是真正愛國鬥士們所不容閉目的。那麼應該怎樣挽救呢？

因此而就與日本帝國主義者談判和平嗎？這是汪派漢奸的說法，是一部分資產階級所要走的道路，也是游擊區中的地主富農即游擊政權的主要靠山所要走的道路，這是陷中國民族於無法翻身境地的道路。這些漢奸與充滿反動性的階層，急於要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以圖保護他們的財產，根本不會求助於下層

民衆，反而最害怕下層民衆。然而事實上只有民衆的力量，才能挽救目前游擊區的危機，而鞏固那裏的抗戰的基礎。歷史證明，可以成爲游擊區的最可靠最鞏固的基礎的只有貧農。但貧農目前的生活已因抗戰而更加悲苦，他們處在地主富農與游擊區軍事統治的雙重壓力下，所以他們對於抗戰冷淡，他們的力氣表現不出。所以要想使貧農成爲抗戰的主力，要想游擊區的抗戰力量能鞏固持久並擴大，則除了澈底改善他們的生活，把土地，首先是不積極抗日的地主富農的土地加以沒收而分配給他們以外，換言之，除了實行那過去曾經實行於江西的土地革命政策以外，別無道路。

（四）論『農村經濟能否支持游擊戰』

自南京徐州相繼淪陷之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抗戰論調，都轉而主張游擊戰略，於是中國農村經濟能支持游擊戰的觀察，成了這般人的游擊戰略主張的經濟基礎。美國的『遠東考察』(Far Eastern Survey)雜誌上，在一九三八年底曾刊出了『中國游擊隊的戰時經濟』一文，作者漢威爾(N. D. Hannell)從中國農村的生產與消費各方面，說明農村能支持游擊戰爭。後來，國內論此問題者，都不出此文所論的範圍，故我們現在可借該文作爲研究此一問題的對象。

這篇文章的內容，總括起來是說：中國經濟與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同，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鄉村依賴着

城市，城市的頭一斷，鄉村的四肢就不能生存；中國的鄉村經濟還大半停滯在自給自足的狀態，都市的工業商品滲入農村的極少，故離開了城市，也能生存。於是該文考察中國農村的糧食生產額，綽有餘裕，能够自給；衣服原料的棉花產量很豐，故衣服也能自給；很多年來，手工業仍是中國農民的主要副業，城市輸入的工業品大都非農民的必需品，故即使這些工業品的輸入斷絕了，手工業也可以製造土貨，以應農民的需要；農村燃料大都是稻草、高粱幹、麥秸、荳莖之類，無缺乏之虞；軍火已能設立小規模工廠自造，也能自給；鹽則內地的鹽井、鹽湖不少，也可有適當地供給；又有無線電可以利用；最後，游擊區中已以政治手段減輕農民的租稅率，廢止高利貸，這即是從根除去過去農村土匪發生的基因，因而又可解決農村中向有的土匪問題。於是，該文結論說：日軍即使遮斷了大都市和內地的聯絡，然因中國農村經濟有此特性，故農村仍可以不受多大痛苦，中國的農村經濟能支持游擊戰。

上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點，許多都是事實，並且在某些落後省份中，或許完全是事實。但由這種事實是否就能得出結論說：中國農村經濟能支持游擊戰，則還是有待於討論的問題。

假使游擊區之外，並無敵區之存在，而且在游擊區所位的農村從前從未與敵區所位的大城市發生過經濟的聯系，這即是說，假使游擊區是脫離其周圍的環境而孤立的，是離開歷史條件而從天上掉下來的，假使是這樣，則上邊的結論或許是對

的。因為，在空間上既然是孤立的，則只要內部的食用不成問題，牠就可以自己存在，而無被外界擾亂或推翻的危險；在時間上既然是無生而自存的，則牠就可以擺脫任何的歷史牽制而自由了。但無奈，這種情形都是該文作者的幻想，因而落到事實上，他的結論也就成了問題。

並且假使游擊區之內，並無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之分，即是說並無階級的存在與衝突，而都是像該文作者同層的壓迫者或被壓迫者，那麼只要他願意忍受城市與農村割斷的苦痛，大家就都無話說，則他的結論或許是可以得到的。因為這時候內部既無階級的衝突，長久在可憐的經濟生活下團結對外，自無多大問題。可是，事實上，在任何時候，農村中的階級鬥爭都未停止。因而，該文的結論，也就成了問題。

明白地說：提出這種意見的人，並沒有看見游擊區與敵區的經濟是在對立發展，互相鬥爭的過程中的；他們不明白游擊區經濟是否能支持游擊戰這一問題，不能簡單地由游擊區經濟能自足自給這一點就得到是定的答覆，而主要地應該考察游擊區經濟是否能戰勝敵人的經濟進攻，換言之，即除過自給自足以外，是否還有餘力抵抗得住或克服敵人的經濟進攻之後才能作答覆。他們也沒有看見游擊區內的階級矛盾，各階級尤其是地主富農對於生活要求之趨上性，他們不明白游擊區之是否能抵抗得住區外的高級經濟的壓迫，也不能單就牠的食糧够用，及具備過自給自足生活的物產來下判斷，而當着重於各主要階

級是否能不得不停留在這一退後生活狀態上以爲斷。如果敵區的經濟力量太優越，而游擊區又無力遮斷其侵入（無力消滅商業的『滲透性』），則這種優越經濟便能壓迫並引起游擊區中的經濟關係，因而政治關係的變化，到這時，縱使是能自給自給的游擊區也不能不走向屈服的道路；這即是說，敵人的經濟優越勢力之侵入，要引誘地主富農加速走上叛變反動的道路。

馬爾薩斯孤單地非辯證地就人口生殖的速率而得出結論說，世界人口二十五年要增加一倍。然而事實上人口並沒有照着他的結論而增加，因爲人與自然的關係及人類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阻礙了牠。農村能支持游擊戰論者，孤單地非辯證地由農村能自給一點理由就斷定農村經濟能支持游擊戰，而不看敵我經濟鬥爭中的力量比重，不看游擊區的戰鬥力量是建在怎樣的基礎上，則他的論斷之錯誤是當然的。至於這樣議論之只籠統地以中國農村作一個整體來論各種物品之能自足自給，未把中國劃分許多部分來考察某部分的何種物產能自給或不能自給（因爲凡是游擊區都只佔中國的一部分），而就得出農村經濟能支持游擊的結論，其錯誤尤爲明顯。

我們並不否認，對比着敵軍在淪陷區中之不易穩定其統治，就是不很鞏固的游擊區也會維持相當長期的存在，對敵人的物力與人力能收相當消耗之效。但是抗戰既是長期戰爭，就應該講求最有效，最能減少民衆苦痛的道路，以期能越快越好地，及最有把握地達到抗戰勝利的成果。由此說來，目前游擊

區的經濟與政治狀態實是極危急的，而最能達到抗戰勝利，最能減少民衆苦痛的道路，只有澈底改良貧農的生活，提高他們的精神，使成爲游擊區中的主力。如果能這樣，則不僅地主富農的反動傾向將根本被消滅，不僅游擊區可以無限鞏固，戰爭力量可以無限加強，而且風聲所播，各省農民將都起而提高抗戰的精神，使日本佔領的區域中到處都是強韌勇敢的農民抗日隊伍。這樣，日本帝國主義之被驅逐出中國，可以易如翻手地達到。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

學術叢刊第一輯

破曉目錄

破曉（詩）

野老

日本與中國

劉海生

俄國歷史發展的特點

L·達維道維奇

淪陷區的農村經濟

柯大章

從美國說到芬蘭

燕生

國民大會與憲政運動

紅葉

羅曼·羅蘭新論的申論

野老

評艾思奇的哲學及其淵源

鶴鳴

抗爭的前夜（小說）

少翁

水落石出（書報介紹）

海娜

抗戰中之物價問題

劉海生

抗戰以來物價的步步上昇，已成了中國民族抗日戰爭中的一個嚴重問題。不僅感到切膚之痛的勞苦民衆，就是迷醉於『國難財』底『賢明的』有產者也不能不注意這個問題了。當然，前者與後者的注意純然出於兩種不同的動機：民衆是從自己的生存與整個民族（他們構成這個民族的大多數）的利害關係出發，而一般勢利之徒，則只是關懷少數人的統治權和利潤而已。這個問題也正如其他一切問題一樣，因觀察者的利益和動機的不同，而各自得出之結論和政策亦不同。現在關於物價問題的專論已不斷出現於報章雜誌，但牠們的立論不是有意掩蔽真相，抹殺或減損事實；便是半吞半吐，徘徊於兩種絕對相反的利益之間，能真正本自科學的良心，有系統地分析問題的真相，以充分反映民衆，尤其是工人底呼聲的可以說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這不能不說是抗戰中一個可悲的『小缺點』吧！但其實這個『小缺點』也正是整個抗戰底大危機的構成部分。如果我們不能填補牠，我們也就不能挽救整個抗戰底大危機，申言之，如果我們不能在物價問題上得出一個正當的解決辦法，我們也就不能解決抗戰的其他重大問題，而在物價問題，正如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假如不能滿足中國民族大多數人的要求，我們就不能動員廣大民衆走上抗日戰爭的道路，甚至

還不能打破日帝及汪派漢奸的欺騙和蠱惑！本文的目的就是站在科學的觀點上，把物價問題的真相加以澈底的暴露，並得出一個澈底的結論和解決辦法出來。

一 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物價高漲的趨勢

中日戰爭爆發前後，中國物價急促增漲的過程，大概可以拿法幣購買力做標準（當然不是唯一的標準），劃分幾個時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實施外匯統制是第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物價因開始感受戰事的壓迫而突呈上漲之勢，但還不是很普遍的，只限於直接受戰事影響的區域；第二個時期就是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六月，法幣平準基金委員會通令停止出售外匯，在這個時期內，中日戰爭範圍已擴大，物價已呈現普遍的直線的上漲之勢，但尚比較平穩；第三個時期便是一九三九年六月至現在，物價突然好像失了拘束的野馬，連續暴漲。我們現在爲了方便起見，暫拿上海的物價做標準來說明這三個時期，據官方的調查，上海生活費指數，一九三六年爲一〇〇，一九三七年爲一一八·一五，一九三八年爲一五二·九〇，一九三九年爲二〇三·二五，表面上看來，上海物價的上漲，和上述的分期有點兩樣，但事實上我們不能

單憑這種籠統的數目字來下結論，在這個籠統的數目字後面，還隱蔽了許多真相。假如我們把一九三九年生活費的按月指數來檢討一下，我們便立即暴露一個可怕的現象出來。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尚在一五〇，一六五之間，……九月竟突然飛漲至二八三·二三，十二月又飛漲至三〇四·〇六了。其次我們更具體的分析一下上海幾種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下面的表也是一個官方的統計：

品名	較一九三六年所增之百分數	品名	較一九三六年所增之百分數
炭	五七二·九八	豆油	三〇四·一五
劈柴	三〇〇·〇〇	粳米二號	二九〇·二九
糯米變元	二八一·六四	秈米一號	二七八·一五
煤球	二七二·八一	廢木柴	二四二·八六
洋山芋	二四一·六七	鮮鴨蛋	二三三·三三
煤油	二一九·一二	豆腐	二二二·五〇
土布	二一〇·八七	鹹雪菜	二〇七·二七
韭菜	二〇六·六七	豆腐乾	二〇四·〇五
豬油	一九五·一一	火柴	一九五·〇〇
樓房東洋式	一九一·九八	鯽魚	一九一·七八
雞活	一八三·一三	平房	一八二·三二
粗布十三磅	一七六·四七	草紙	一七三·一三
黃豆芽	一六六·六七	肥皂固本	一六二·七五
樓房石庫門	一六二·〇三	油豆腐	一五八·九六

斜紋布	一五六·六七	高粱	一五五·九二
條格布	一五五·〇〇	細布十二磅	一五四·九五
鮮魚	一五〇·三一	麵粉老車牌	一四九·七七
開水	一四七·〇六	鮮豬肉	一四五·八九
百頁	一四五·一〇	鹹白魚	一四三·七五
線粉	一三九·一三	白糖三五溫	一三二·二〇
切麵	一二九·七三	黃酒	一二四·四七
茶葉	一一七·一四	絨布	一一五·六六
發芽豆	一一四·二九	鮮牛肉	一〇九·二一
漂布	一〇七·四七	線呢	一〇三·四二
香烟金鼠	九一·四九	棉花	八八·六八
鹹豬肉	八二·七二	花標布	八二·四七
男線襪四二支	八〇·八八	菠菜	七八·五七
青菜	七四·二九	醬油雙套	六六·六七
白蘿蔔	六一·七六	鹽	四二·八六

這個表只告訴我們一九三九年一年的零售物價指數，而且顯然還隱蔽了物價高漲的真實程度。憑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記憶，我們總可以大大修正這個統計。上海的米價在戰前每担不過九元，一九三八年漲十元左右，一九三九年一二月漲至十一元左右，四月份漲至十四元，六月份又漲至十八元，至九月份竟漲至三十二元左右，十二月份則突破了四十元大關，現在又已漲至五十餘元了，上海房租在戰前一個亭子間不過四五元，平房不過二三元，統樓客堂每間不過八九元，一九三八年已增

加一倍，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則已增至三四倍了。煤球是上海的主要燃料，戰前每担僅一元左右，一九三九年初尚不出二元，六月以後便急促增漲，九月已漲至四元，現在則已漲至六元了。豆油戰前每斤二角，現在已漲至一元左右。其餘如麵粉，衣服，肉類等價格通通一個樣，那末比之一九三六年增加四五倍，三四倍的又何止像上表所指出的炭，劈柴和豆油。其實戰後一般物價暴漲的趨勢，其他地方也相差無幾：據最近報載天津米價已突漲至四十八元一包，煤為一百零五元一噸，從前普通棉鞋四五元一雙，現已漲至十三四元一雙，至於直接受日軍支配的淪陷區，如北平麵粉每袋已漲至十五元，肉類漲二三倍不等。杭州本地產頂上白米每石須三十五六元，還不容易買到。汕頭現粟每担四十餘元，白米每元僅二升四合，蕃茹每元二十斤，柴每元十三斤，豬肉和豆油每元各十二兩，煤油每元十三兩，火柴每元廿盒。也許有人說，上述的材料只證明淪陷區和受日本控制的租界的特殊現象吧了，那末我們再拿非淪陷區的情形來揭破這種自欺欺人的話吧。昆明糧食類：米價每石四十六元，豬肉每斤一元三角，豬油每斤一元八角，菜油每斤一元三角，牛肉每斤七角，蔬菜每斤由二角至三角，食鹽每公斤七角。燃料類：柴每百斤（六十公斤）五元至六元，炭每百斤十九元，火油每罐四十元，衣服類：斜布每尺七角，蚊帳布每尺三角五分，土布四角，西服每套由一百元起，襯衫，十元起，皮鞋，每對（洋珠皮）五十元，膠鞋（大中華力士）每雙

五元，襪每雙一元二角。日用類：毛巾每條一元二角，洗衣視每件八角，棕欖皂每件一元五角，力士皂每件一元一角，力士或黑人牙膏每枝一元，牙刷（梁新記）由一元至二元，髮膠（滬製）每瓶三元，火水燈每枝一元五角，油燈每枝二元。藥物類：平均每項比香港約貴五倍以上。福州白米每石四十二元六角，衡陽自來火每盒須五分，土布每尺三四角。重慶之必需品價格竟達抗戰前之數倍或十倍，茲將一般日用工業品的價格列表如下：

物名	數量	現價	事變前
外套	每件	百元——三百元	三十元——六十元
皮鞋	每雙	二十五元——六十元	五元——二十五元
老刀烟	每包	六角	八分
棉布	每尺	一元	一角
手巾	每條	六角	一角二分——一角三分
襪子	每雙	二元	二角
電燈泡	每個	八元	一元三角
石油	每斤	二元五角	二角五分
蠟燭	每根	四角八分——五角	六分
洋火	每盒	五分——八分	二分
前門烟	每包	一元一角	一角二分

我們的材料雖少，但也可以大略測知非淪陷區一般物價的可怕。一般的說來，沿海都市的物價以農產品（如食糧，原

料)爲最高，內地以工業品及西藥最高(內地西藥比沿海貴五倍)。但物價的驚人普遍上漲却是一樣。這就證明：戰爭已把中國物價的雙重嚴重性(過度的不平衡與絕對的增漲)發展到了極致。

二 抗戰中中國物價高漲的直接原因

我們現在澈底的了解一下中國抗戰後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

首先我們研究一下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經濟生活所受的影響。在公開和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之下，中國市場的微弱的交通脈絡，首先被破壞了；截至今日，日本已差不多破壞和佔據了全國鐵路線和一大半公路，又不僅控制了領海，還霸據了三大江，而在線點之外的中國游擊隊或正規軍，也爲了擾亂敵人的後方，不斷自動破壞鐵路和公路，甚至未被日本佔領的省份，爲了預防日本的進攻也自動破壞交通線(如廣西之破壞近北海一帶的公路便是一個例)；其次，敵人爲了掠奪中國的資源，爲了獨占中國的市場，又爲了封鎖未佔領區及游擊區，他們有系統的進行統制和沒收佔領區中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第三，在戰爭中軍需品的巨量銷耗已使中國法幣的基金削減，而敵人又在佔領區中有系統的用不兌現偽幣或軍用票來掉換法幣，藉以套取外匯，結果數度引起外匯的漲風，使法幣購買力從一先令二便士的法定比價跌至三便士多的最低點！第四，一九三九年

九月歐戰爆發，使全世界的市場失去平衡，更加重了戰時中國市場的混亂(物價，金融引起特別厲害的波動)；末了，第五，中國抗戰直到今天還不是在全民武裝和民衆有組織的監督之下，更不是在民衆權力機關(「普選的國民大會」)之下進行的，抗戰當局因爲本身就代表少數富有者的利益，結果，金融家，工廠主，地主，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甚至稍爲過得去的中產之家，也肆無忌憚的利用戰爭所造成的上述條件，或操縱外匯，或囤積居奇，或藉勢壟斷，或通敵投機，——總而言之，趁火打劫，發國難財。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經濟所受的這幾種影響便成了加速物價高漲的直接原因。這幾種影響愈是擴大，物價也愈是高漲。不過我們光是平鋪直敘的舉出這幾個原因還不能澈底明瞭物價問題的真相，爲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還要作進一步的暴露。現在沒有一個人敢否認上述的幾個原因，不管資產階級報紙也好，提倡「勞資合作」的工賊和改良派也好，他們都不敢隱瞞牠們。但他們却一致認定物價高漲的最主要原因是敵人的進攻，而中國富有者的發國難財，他們則認爲是最次要的原因，甚至把這個現象只歸咎於「某些」奸商，而對整個有產階級則認爲「良心」尚在，認爲他們還是「賢明的」，「愛國的」等等。這種理論，現在可以說是流行一時，同時也成了中國有產者的唯一護符。假如我們把牠仔細分析一下，我們立即便暴露牠的欺偽性。不錯，我們也認定目前中國民衆的一切痛苦都是敵人的進攻引起的(其實這也是相對的說

法，假如我們從歷史上觀察一下，這一次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却又正是中國有產者叛賣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後果，強盜的打劫是開門揖盜的內奸造成的。但我們却絕不因此便看輕中國本身的原因。許多事實證明，中國富有者的趁火打劫對物價的影響正不下於敵人的進攻，同時許多事實也證明，趁火打劫的富有者不僅是『少數奸商』，還不多不少包括了整個中國有產階級。沒有一個奸商不和敵人狼狽為奸，但沒有一個有產者不或多或少和投機事業有關。廣州未失陷之前，某要人創立的糧食運銷處操縱了廣東全省的糧食出入口，買賤賣貴，無所不為。雲南當局的操縱糧食也成了公開的秘密。福州的各種貨物幾無不居奇牟利。上海是中國有產階級的大本營同時也是投機操縱的巢穴。那末我們把牠當做代表來詳細觀察一下吧。我們上面已說過，一九三八年三月起，中國物價上漲有普遍之勢，一九三九年六月起，中國物價便開始暴漲，這個現象顯然與中國的貨幣購買力有密切的關連，因為上海外匯黑市場的產生和外匯暴縮的風潮完全與物價高漲的過程一致。那末，外匯投機與物價操縱顯然是不可離的。據去年申報的一個有趣的統計，去年上半年上海各業漲價共二百〇三起，拿各月來比較，則一月份五起，二月份十起，三月份十九起，四月份十七起，五月份十四起，六月份突然增至一百三十八起，佔漲價起數十分之六。六強！這位記者於是做了一個正確的解釋說：『這因為六月份裏黑市外匯一度收縮後，一般居奇囤積的

商人，趁火打劫的明證』。外匯的猛烈收縮起自六月份，一直從去年五月的八便士跌至八月的三便士二五；這個時候也是外匯投機和物價高漲最厲害的時候。九月歐戰發生，外匯雖略呈起勢（回至五便士左右），但這對於物價已無能為力了，因為『歐戰爆發，輸入銳減，進口物品已經有漲價的可能，何況一般人又鑒於第一次歐戰的前例，以為囤積洋貨，定可獲利倍蓰，故居奇不售』（銀錢界第四卷第一期）。那末歐戰倒還更助長上海商人的投機了。他們大都是利用每一度外匯的收縮，沒有等到進新貨的時候，便立刻把存貨一律漲價。歐戰發生，他們更趁機囤積洋貨，如德國之機械，藥物等，以便待價而沽，據上引雜誌的同一作者說：『歐戰勃發以後，幾乎沒有一種物品，不是投機者的對象。五金，藥料，煤炭，布疋，甚至鬧到年底把人民生活主要品的米和麵粉，也都在囤集之列，……』其實，這種現象不是從歐戰爆發以後才有的，歐戰只不過把牠表現得最尖銳吧了。中國銀行資本在任何時候都是投機之王，而任何一次投機的風潮，要是沒有銀行的參加也是不可能的。戰後，上海銀行業的投機押款一時繁盛起來，牠們利用龐大的資本操縱了整個投機市場，如最近引起輿論不滿的米糧押款便是一個例。那末，這一切正可以證明：上海從銀行家到各業資本家，沒有一個不間接直接，或多或少與投機事業有關的，所謂『無商不好』誠然不是一句虛語了。在上海這種發狂的投機熱中，有產者的『商業道德』也特別表現得無恥和墮落。如去年

末米糧價格飛漲最厲害時，報上發現這個消息：『最近有法租界太平橋菜市路三十九號光華米店，竟異想天開，在其門市零售時，所用規定之鋼質升籬匣中，墊以馬糞紙約寸許，朦混盤剝貧民……』。新聞報副刊上一位讀者又提出這樣的控訴說：

『前天（十八日）午後一時，向某店購米一石，價三十元〇八角。因為信任他是正當商店，決不會有短少米量情事，所以在該米送來的時候，未曾對送米人當面覆秤。旋又介紹鄰居某君，向該店購米兩石，價和前同。該米送來時，分裝四袋，並附有不蓋圖章不貼印花之白紙一條，僅寫『白破兩石』，及一價碼，絕不類商店發票。某君疑竇頓起，經逐袋覆秤，發覺每袋各少米八斤，兩石合計共少三十二斤。該店送米人，因事實證據俱在，無可狡辯。同時我亦將先購的一石過秤，連袋祇有一百卅八斤，比某君的米，更少得多了。（按米店定章：每石淨米一百五十六斤，市秤。袋一只作二斤，）現在連袋只有一百卅八斤，不是一石要少廿斤嗎？』其實，在門市零售中用各種方式欺騙貧窮消費者已成了家常便飯了。

我們在上面僅暴露非淪陷區或上海租界中中國有產者的投機操縱與物價的關係，我們認為在揭破上述的欺騙上，這是很切實和有力的證據。當然假如我們引證淪陷區的情形那就更露骨了：所有淪陷區的商人，富農，地主都沒有不直接間接和日本軍部勾結，共同操縱物價的，他們或經過『中日合作』的名義，或經過其他關係，托庇於日帝的指揮刀來壟斷居奇。不過

我們引證這種情形是不會令人心服的，因為人們已很有勇氣的稱淪陷區的奸商為奸商，正如他們已毫不躊躇的稱淪陷區的統治者為漢奸一個樣了。

三 物價高漲對中國各階級的影響

我們既明瞭這次中國戰時物價激漲的直接原因，我們便要進一步來研究這個現象所直接造成的社會後果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清楚更澈底的暴露物價問題的真相。我們現在研究：

第一，物價與利潤的關係 在抗戰中中國有產者不惜破壞，甚至出賣祖國來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究竟是為的什麼呢？是爲了超額利潤的追求，爲了發國難財。我們爲了方便起見，仍然引證上海的實例來證明。據報載，戰後上海租界區內之華商紗廠，計申新二廠九廠，新裕一廠二廠，永安三廠，鴻章，大同，勤豐，統益等廠，共有紗錠四一，八八八枚，布機一，九〇三台，去年因紗布市況奇佳，每紗錠萬枚可獲利至五十萬元以上，甚至有獲利至百萬元左右的。又據密勒士評論報阿拉爾斯君的估計，今年本埠的棉織業好況是引起全世界驚異的。上海多數英日中棉織廠都獲得有史以來的最高利潤和分發最大的紅利。米糧業的獲利也是意中事，上海米業行號不下三千數百家，去年因金融變化，乘機操縱米糧的結果，大都坐獲巨利，如恒大，致成，瑞昌發等米號盈餘有二三十萬元之鉅，最少者亦有數千元的純益。麵粉廠也大獲厚利，如福新廠盈餘

達一千二百萬元，阜豐廠盈利達九百萬元。甚至鮮味業去年也獲得較戰前超出三倍的巨利。其他如水電交通地產各業，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具體的材料，但去年通通大獲奇利。尤其是金融界，我們上面已說過，牠們是投機大王，那末牠們自然也是利潤大王。據報載，去年滬上銀行業所獲巨利為十數年來罕見之盛況，中國通商銀行盈利約達國幣一百十萬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四行儲蓄會兩家盈利各達百萬元，浙江興業，浙江實業，四川美豐等十數家銀行盈利達七十萬元，官辦之中國，交通二行，亦盈利四十萬元。其次是錢莊：如福康，順康，滋康等十數錢莊盈利三十萬元以上，長盛，五豐等二十餘家錢莊，亦達十萬餘元，甚至銀號如匯中及匯豐等亦獲十萬元的巨利。這便是上海和全中國有產者從物價高漲得來的『國難財』。一開始他們還常常引用他們的戰時損失清單來辯護，等到他們的報紙也半吞半吐的承認這幾年來的所得不僅已補償了戰時的損失，而且還獲得大大盈餘時，他們又指出法幣對外價值的低減來辯護，殊不知他們的利得又早已在外匯投機中轉成新的投機資本（如囤積新貨等）了。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戰時物價高漲與有產者超額利潤的增加成正比例。此外，有產者即在消費方面也享有一個特權。他們可以用長期積備或批發的方式來消費。當今天一般窮苦消費者不得按照市面高價消費時，有些有錢人尚在食十二元錢一担的米，用二角一斤的油，即使他們事先沒有積存，

他們仍可從大批購買，或直接批發中買得比零售市價更便宜的消費品。那末，我們還可以而且應該做出一個補充的結論：有產者的戰時超額利潤甚至還應加入日常消費中佔便宜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的驚人純利。如果他們還有什麼話說，那末，我們索性把他們的更驚人的秘密暴露出來吧。

第二，物價與工資的關係 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現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利潤與工資也是兩種不可調和的物質利益。假如物價高漲與利潤的疊增成正比例，則物價高漲與工人實際工資的增加就成了反比例了。我們還是舉上海的實例來證明吧。下面的表是上海工部局的材料：

一九三九年較一九三六年所增減之百分數		一九三九年較一九三六年所增減之百分數	
工資率			
男工	(一) 八·三三	女工	(十) 一七·〇二
時工	(十) 五·六六	時工	(十) 二四·四四
件工	(十) 一二·二八	件工	(十) 一四·二九
實際收入*			
男時	(一) 四·一三	男時	(十) 二六·四四
男件	(一) 二·三四	男件	(十) 七·九〇
女時	(十) 四五·一三	女時	(十) 五三·九一
女件	(十) 三五·三六	女件	(十) 二四·九一

* 實際收入即指名目工資加津貼。

這個表最有意義的是指出男工的工資，較戰前普通的削減了，只有輕工業部門的女工工資略略增加。而一九三九年較三八年，則男女工工資也略略增加。但假如拿工人名目工資增加的程度和生活費增加的程度一比，我們便得出一個可怕的結論。底下也是工部局發表的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之真實工資指數表：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實際收入指數	100.00	84.83	93.36	129.09
生活費指數	100.00	28.15	153.90	203.25
貨幣購買力	100.00	84.64	65.40	49.30
真實工資指數	100.00	71.80	60.33	58.59

這個表證明一九三九年工人的名目工資，雖已恢復或略略超過戰前的水準，但真實工資僅及一九三六年之六十弱。其實，我們上面已指出過，官方的生活費統計是籠統的，不確實的，他們的結論與實際情形相差很遠。按照常識推論，工人的平均生活費何止超過戰前兩倍多，恐怕三四倍也到了。這就是說，工人所得的實際工資，比官方的統計還要低得多。工作時間的延長及其他待遇的惡化更加重實際工資削減的意義。據工部局調查去年上海各業工人平均每月工作二三·七八日，一九三八年則為二三·六六日，一九三六年為二二·四八日。『就一般情形而論，本年（一九三九年）各業皆忙，造紙業每月工作日數最多，平均為二八·五九日，其次榨油業，為二七·八一日，

又次麵粉業，為二七·二二日。』工作時間延長同時勞動強度也增加了，工廠當局對工人的鞭策，如罰款，計件工資制等達到了最黑暗最野蠻的程度，而工人家族的死亡率也委實嚇人。那末，工人實際工資的削減應加入工作時間過度延長及勞動強度過度提高，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前者如罰款，積勞致死等，後者如精神萎靡，道德與智力衰退等），這才是觀察物價與工資關係的正確標準。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現在有權利做出一個總的結論：物價高漲所給予資產階級的驚人的超額利潤原來就是工人實際工資過度削減，工作時間過度延長，勞動強度過度提高的產物，換句話說，在物價高漲中，資本家的驕奢淫佚原來就是建築在工人的貧病死亡上面的，有產者原來是在工人的屍身上跳舞！

第三，物價與一般小資產階級生活 在物價高漲中，城市各公司的職員和手工業者所受的痛苦也並不下於工人，他們平均每月不過十五元至二十元薪給，假如有家庭負擔，則簡直難於度日。新聞報十二月廿六日副刊上刊載一個信，可以代表一般小職員的悲慘生活：

『我是供職於某某商店的一個起碼小職員。老板對我們的待遇怎樣呢？唉，說也可憐，每月僅有七元罷了！在戰前，店中生意甚佳，每年可盈餘八九千元。八一三戰事發生後，因營業稍受影響，於是，我們的薪水，便大大的打起折扣來。先是

五折，到今年六月，才算改爲八折。先生，你想，目下生活程度多麼高，剃一次頭，就需三角，洗一次浴，也非四角不辦。充作早上點心的大餅，油條，現在已由二分加到三分。其他鞋，襪，種種日用必需之品，有那一樣是便宜的？這區區七元，够什麼分派，如何維持？我們的老板呢，日打關槍（吃鴉片），夜玩舞場，逍遙作樂。何曾顧到我們一點苦楚？聖誕將屆了，只見他買這樣，買那樣，大包小包從公司裏帶回來，預備送禮。他的房間內，也佈置得金碧輝煌，更顯得高貴富麗，雖然米價狂漲，角票分票缺少等等恐慌，送一連二的襲來，然而，這與他有何關係？他既有戰前歷年積下的盈餘，又有戰後從事投機生意賺得的大批花花綠綠的鈔票。財力真充實得很啊！想我們一般小職員，幫老板做了多年事，現在逢到困難，他既有的是錢，在理應該照顧我們一些。然而他們永遠想不到這些的！（××商店一個小職員上）

知識階級也陷入悲慘的困境了。去年新聞報副刊載有一封通信，是描寫西南聯大的學生生活的，我們現在摘錄一點如下：

『昆明物價奇昂，外江佬來已一年以上者，多無襪赤足。聯大學生大都滿面鬚髮，蓋校外剃一頭須六角，校內亦三四角也。聯大學生膳食，係學生自組膳食委員會，每人出費十五元，米係糙班米，每人可食五六碗，菜碗如上海飯碗大，且底部突出。幾片菜葉，或豆芽，餘俱是湯。第一碗飯，每人幾筷

菜即光。以後即須白吃，某學生云：白吃亦很甜，可惜來不及細嚼。

早晨一粥，等於吃粥湯，每人可灌上四五碗，未上課已餓。一學生常挺胸曰：我輩肚皮固空，呼吸十分暢。……

『學生最怕之事，爲文具缺乏。做實驗報告之十六開報紙一張，價已漲至一分半。每天至少用六張，即須一角。其他一破橡皮一鉛筆頭，俱係至寶。許多學生，俱謂皮鞋八十元一雙，於我等不生影響，墨水八角一瓶，實在吃不消。

昆明最近大雪奇寒，惟日中仍夾衣，學生冷中相遇，多聳肩微笑。……』

當然這種描寫多少還帶點輕鬆，但骨子裏却表現他們的生括是非常黯淡的。中小學教職員的生活與普通大小店員差不多。至於靠賣文爲生的所謂頭腦勞動者，情形更壞，除了少數有特殊地位和社會關係的作家之外，普通文化人每千字只得到一元錢的稿費，他們受書賈的剝削是無抵抗的，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抵抗的條件。其他城市的『小人物』如小販雖然偶然也在投機中沾點小惠，但日常消費品的過度高漲與貨幣制度的混亂立即又使他們消滅了。

這還是城市的情形，我們相信農村中的情形必然更壞。在這樣沉重的生活壓迫之下，失業與死亡以同等速度而增加。現在所有失業者的變相名稱便是難民，假如我們把全國難民的總數統計一下一定嚇人。至於死亡數，光是上海一埠，去年冬

季數月之間便達數千人，這還是官方根據普善山莊一處的統計，真實的總數恐怕一定大得多。

上面的事實使我們得出一個更完全的結論：在物價高漲中，少數有產階級犧牲全人口的絕大多數來積累無比的超額利潤。

四 物價高漲與階級矛盾

自從抗戰發生後，『勞資合作』便盛極一時，一切參加抗戰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派都拿這種學說做標榜。事實上，在一個階級矛盾的社會裏，這種學說絲毫掩蓋不了，也緩和不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鬥爭，即使在民族危機非常嚴重的條約之下，這種鬥爭只有更加激烈，絕不會和緩，因為環境愈加惡劣，每一階級爲自己而犧牲他人的鬥爭也愈是厲害。過去二年來所謂『賢明』和『愛國』有產者之肆無忌憚的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以及相應於此的政治上的嚴厲壓迫已從反面證明在民族抗戰中階級鬥爭的不可調和。總之，社會的發展乃遵循其自身的規律而絕不是遵循人們的意志。除非這個社會已整個死亡了，又除非被剝削者自甘於自殺和餓死，否則物價的無止境的高漲必然要引起劇烈的爆發的。

上海職工因爲物價高漲及生活困難而爆發的罷工鬥爭，從一九三八年末便略見抬頭。不過從一九三八年末至一九三九年

六月以前，上海職工的罷工大致上還是緩慢的，零星的，而且還只限於小廠（以滬西的小綢廠佔多數），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時期，物價的上漲還比較平穩，職工的一般要求也不很高（他們的中心口號不過是恢復戰前的名目工資）。一九三九年六月以後因物價的劇烈上漲，不僅在職工中就是在其他民衆中也引起極大的恐慌，因此，職工罷工便急速增長，尤其是十二月，職工受了年關的刺激，一個月當中竟爆發了四十餘次罷工，包括三四十家店廠和二萬餘職工，鬥爭已不限於小廠，連許多大廠大公司（如永安，大新，先施，國貨，永安紗廠等）也蔓延到了。這是抗戰二年來罕見的現象。至於其他民衆的最大門爭便是貧民的搶米風潮，去年十二月這一風潮構成嚴重的局面：竟有一日之間發生搶米二十二次的。這就完全證明物價上漲愈烈，階級衝突也愈烈。

五 假的慈悲與假的藥方

我們在上面已說過，物價問題既已成了抗戰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假如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則抗戰勝利的前途就要大受打擊。但可惜我們直到今天還看不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尤其不幸的是，我們即在物價問題的解決方法上也只發現『階級利益的衝突』而沒有發現絲毫『調和』或『合作』。我們的抗戰政府一開始簡直不注意這個問題，等到這個問題已日趨嚴重，足以威脅社會的安寧時，他們才着手頒布一些法令，如非常時期

評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取締囤積日用必需品辦法，平價購銷辦法，規定最高米價及徵收過分所得稅等。這些辦法的內容綜合起來不出如下幾點：（一）由地方當局及商業團體共同成立評定物價委員會規定數種日用品之最高價格，（二）規定日用必需品之存儲數額，超過部分限期出售，否則以公平價格收買之，（三）由政府購辦消費品，按平價發賣，（四）徵收戰時投機利潤稅。在表面上這些辦法似乎應該能夠相當遏抑物價的高漲，但事實却不是那麼簡單。第一，這些辦法表面上即使如何『公平』，苟執行者仍是貪圖私利的有產者及其代表而一般消費者（勞苦大眾）沒有參預的權利，則『公平』也就變成不公平。第二，這些辦法本身還充滿維護少數有產者剝削特權及一己私利的精神，牠們對囤積居奇者極力避免採取直接沒收等『過激』手段。正因為有了這兩個缺點，所以上述各種應急辦法根本不能抑制物價，牠們充其量也不過在有產者內部盡一種極短促的『仲裁』作用而已。遠者不說，我們且拿上海租界當局及商業團體的物價政策來看吧（這些政策當然也是抄襲我們抗戰當局的）。他們最早是規定米糧的最高限價，但每一次米價高漲，他們便於事後規定一個新的限價，結果限價竟跟着米價的後面一步一步的提高，這就證明，有產者及其代理人的評定物價只不過是使商品的投機價格合法化而已。至於以『公平價格收買』代替沒收，以政府的『平價購銷』來代替民衆對生產和分配的直接監督，其結果當然也不言而喻。或者

『過分所得稅』是有產者的唯一自我犧牲吧。關於這一點，我想最好還是參攷一下上海某會計師的見解，他首先照例批評政府徵收過分所得稅的比率過高，接着他便指出沿海一帶的資產階級是可以隨時逃避這一種不公平的義務的（其實他也應該指出不受重慶直接指揮的地方資產階級也一定要逃避這一義務的）；不過他最末了却安慰上海的資產階級說：你們應注意，在過分所得稅徵收法上，政府已規定凡是戰時會受損失的便可以酌量免收。那末，起碼有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要歸入『免收』一類，因為事實上有那一個資本家不能夠或者沒有權利列出一筆戰時損失清單呵！事情的內幕就是如此，我們還希望什麼奇蹟呢？

六 正當的解決辦法

物價問題既僅僅是一個戰時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歷史的社會問題，那末凡是能順應歷史趨勢的，或者更明白的說，凡是符合大多數民衆底歷史利益的就是正當的解決辦法。我現在試按照中國民衆當前的迫切需求，舉出幾項解決物價問題的最正當的辦法如下：

（一）全國消費者：工人，農民，貧民，學生，管家婦分別組織物價委員會，規定日用必需品的最高限價，實行由消費者自己監督消費或分配；

（二）恢復民衆組織及言論自由，讓他們自由舉發，搜查

囤積居奇的好商，自由批評政府的物價政策；

(三) 爲了預防有產者因爲利潤減少而怠工起見，由工人直接監督生產；

(四) 規定工資薪金應隨物價的高漲而增加；

(五) 徵收財產累進稅，沒收投機奸商的財產充作抗戰經費；

(六) 由民衆的武裝來維持交通路線及緝查日貨及一切私貨偷運，又由民衆的公開革命法庭審判奸商；

(七) 沒收土地首先是漢奸地主，或操縱糧食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難民及抗日士兵以解決戰時糧食問題。

這些辦法也許被人笑爲『過激的空談』吧。但我們根據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又根據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新鮮經驗，急劇的物價高漲也只有『過激』的辦法才能解決了。牠們當然不是一階級，每一個『偉人』能够實現的，被歷史拋到老遠過去的階級和人物不僅不敢採納這些辦法，而且還必然深惡痛絕牠們，但這有什麼辦法呢？歷史已把這個問題那樣嚴重的提出來，誰如果不能解決牠，誰就被牠打碎吧，我們相信合理的解決必有合理的階級來執行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俄國革命前物價騰貴略表

(莫斯科市政府編訂)

一九一四年八月 一九一七年八月 增加百分數

(單位盧布與戈貝，購買力較大戰前低落三分之一)

黑麵包(每磅)	〇・〇二五	〇・一二	三三〇%
白麵包(每磅)	〇・〇五	〇・二〇	三〇〇%
牛肉(每磅)	〇・二二	一・一〇	四〇〇%
小牛肉(每磅)	〇・二六	二・一六	七二七%
猪肉(每磅)	〇・二三	二・〇〇	七七〇%
青魚(每磅)	〇・〇六	〇・五二	七六七%
牛酪(每磅)	〇・四〇	三・五〇	七五四%
牛油(每磅)	〇・四八	三・二〇	五五七%
雞蛋(每打)	〇・三〇	一・六〇	四四三%
牛奶(每杯)	〇・〇七	〇・四〇	四七一%
煤	〇・八〇	一・三〇	一五二五%
男皮鞋(每雙)	一二・〇〇	一四四・〇〇	一〇九七%
棉布(每俄尺)	〇・一五	二・〇〇	一二三三%
衣料(每俄尺)	*二・〇〇	四〇・〇〇	一九〇〇%
肥皂(每普特)	四・五〇	四〇・〇〇	七九〇%

*每俄尺等於二・三四六英尺

(譯自震動世界廿日誌附錄。)